

此心安处即吾乡

——德国汉学家傅吾康在中国的十三年（1937-1950）¹⁾

李 雪 涛*

- 一、家庭影响
- 二、在柏林和汉堡的求学岁月
- 三、攻读博士及最初的学术准备
- 四、初抵北平
- 五、中德学会
- 六、丛书编辑
- 七、杂志编辑
- 八、在北平的汉学家圈子
- 九、汉学研究
- 十、学会汉学著作的出版
- 十一、所交往的其他中国学者
- 十二、学会图书馆建设
- 十三、在北平的生活
- 十四、身份认同——大抵心安即是家
- 十五、圣言会在西山的疗养院
- 十六、超越政治的羁绊
- 十七、短暂的日本之行
- 十八、杏坛春暖及成都两年
- 十九、重回北平及告别中国
- 二十、尾声
- 附录一、1937-1950年傅吾康汉学论著目录
- 附录二、中德学会出版的丛书和单行本一览表
- 附录三、西方人名中西文对照一览

2007年9月6日，一位历经尘世风云变幻的汉学大家，在德国柏林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几天后，他的女儿在致亲友的信中写道：“我父亲漫长的一生，精彩充实，富有尊严而令人敬佩，留给我们宁静祥和的最后回忆。”

*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教授

1) 本文主要依据傅吾康的回忆录《为中国着迷》（第一部）编译而成。该书的德文版为：Wolfgang Franke, *Im Banne Chinas: Autobiographie eines Sinologen 1912-1950*. 2., bearb. Aufl. -Dortmund: Projekt-Verl., 1997 (Edition Cathay; Bd. 11)。本文正文中西文人名译名一律用下划线予以标出，以便于同中国人名分开，西文原名请查文末所附之“西方人名中西文对照一览”。感谢我的同事柳若梅博士在俄文译名方面给予本文作者的帮助。

这位溘然长逝的耄耋老者就是汉学家傅吾康。随着95岁的这位历史见证者的离去，他带走了德国汉学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同时也带走了整整一个时代。傅吾康不仅是一位汉学家，一位中国文化的研究者，更是一位中国文化的经历者。正是从1937至1950年在中国的十三年，为他一生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拟对傅吾康在北平的生活、学术研究及其与学界之交往作一勾勒，以资纪念这位跨鹤西游的德国汉学家。

一、家庭影响

按照中国的说法，傅吾康可以算是出身于书香门弟了，其父为显赫一时的大汉学家福兰阁，傅氏是家中四个子女中唯一继承乃父之衣钵而成为汉学家的。

1912年7月24日傅吾康作为福兰阁的第四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儿子出生于汉堡。傅吾康实际上是在一个充满中国氛围的环境中长大的，在他的家中，好像一切都跟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自传中，傅吾康对汉堡家中的房内陈设作了如下描述：

在我长大的房子中，摆满了中国家具和其他中国物品：在客厅里陈列着中国瓷器以及其他小的工艺品。在走廊摆设有精美的景泰蓝瓶子和挂盘。在我父亲的工作室中，数不清的书架上到处都是中国的木刻版线装书。在父母婚后的最初几年中，他们在吃饭或其他场合所谈论最多的就是中国。家里常常有中国人来访，其中不乏一些知名的人士，如商衍鏊先生，他是名噪一时的老派学者，后来为我父亲所创建的中国语言文化系（Seminar für Sprache und Kultur Chinas）出力颇多。²⁾

因此，中国很早就进入到了傅吾康的心灵之中，他自然而然地想，就像父母一样，有朝一日也要去那个让他魂牵梦萦的中国。童年的他，曾对他端上可口苹果蛋糕的阿姨玛丽·考赫说：“如果你总能给我烤这么好吃的苹果蛋糕的话，我以后就带你去中国！”阿姨很惊讶地将此事告诉福兰阁夫妇，他们对此也感到诧异。³⁾童年的另一件逸事是，有一次父亲的一位朋友来访，在书房中傅吾康指着满架子的中文图书说：“等我长大后，这些书统统都归我。”⁴⁾

正是在这样的中国化的氛围中，中学毕业之后，傅吾康毅然选择了汉学研究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汉学大师福兰阁对此事是如何看的呢？对于儿子的选择，他在自传中写道：

我最小的儿子在1930年中学毕业之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汉学作为他的研究方向。不过这并不是受到我的任何影响，我甚至对此感到非常意外。这可以说是受到了环境的奇特影

2) 出处同上，第3页。

3) 出处同上，第4页。

4) 出处同上，第4页。

响，因为这在生物学上是无法解释的。直到今日，小儿子对他的选择依然是义无反顾。他走了一条笔直的大路，没有迷失方向。跟他父亲所走过的诸多弯路比较起来，当然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了。⁵⁾

尽管福兰阁从未给儿子上过课，但他对儿子的每一个提问，都非常耐心、周详地予以解答，并告诉他有关的参考文献。套用《诗经·大雅》中的一句话，可谓“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父亲丰富的汉学藏书，当然也允许儿子随时使用，这无疑也开启了傅吾康对汉学的兴趣。

二、在柏林和汉堡的求学岁月

1930年夏季学期，傅吾康高中毕业，因为父亲在柏林作教授，按照当时的惯例，他只能选择在其他城市读大学。因为他选择了汉学，汉堡当然是最佳的选择了。当时除了汉堡之外，莱比锡的汉学系也非常有名，只不过福兰阁并不认可莱比锡的教授海尼士所倡导的语言学-世界史方向的经典汉学。这同时也为后来以傅吾康为代表的汉堡学派与莱比锡学派之争辩，埋下了伏笔。

鉴于福兰阁只有一个梵文方面的哲学博士头衔，他在其外交官生涯中尽管受到别人的尊重，但却没有像那些通过了法学国家考试的外交官那样受到政府的重视。因此在父亲的建议下，傅吾康最初在汉堡大学法学系注册。不过后来他发现枯燥的法律条文并非他的真正理想。因此，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傅吾康改在了哲学学院注册，因为汉学是从属于哲学学院的。当时在汉堡大学执掌汉学系教席的是福兰阁的高足颜复礼。

在论及颜复礼的语言教学方法时，傅吾康认为，颜氏不讲什么教授的方法，而是喜欢天南地北地神侃。正是从他对中国文化的闲聊中，傅吾康学到了作为一位未来的汉学家所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和素质。⁶⁾

在教授汉语时，颜教授所使用的是一本英文教材和一本法文教材，⁷⁾并使用高本汉的一本重要的汉字词典，⁸⁾他特别注重文言和白话的同步教授。当时汉堡的汉学系中除了德国的教授之外，还聘请了在汉堡读博士的中国人做口语讲师，以提升学生作为未来的汉学家的综合素质。最初担任中文口语讲师的是在民族学系做博士的来自福州的邱长康，⁹⁾之后由福兰阁的同事商衍鏊（1874-1963）的公子商承祖（1900-1975？）接替。商公子是在汉堡读的中学，说得一口流利的德文。

5) 出处同上，第4页。

6) 出处同上，第30页。

7) J. Brandt,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hinese*, Peking 1927; A. Vissière, *Premières leçons de Chinois*, Leiden 1928.

8) B. Karlgren,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Paris 1923.

9) Chiu Ch'ang K'ang, *Die Kultur der Miao-Tse nach älteren chinesischen Quellen*, Hamburg 1937 (Dissertation).

他于1934年同样是在民族学系获得了博士学位。¹⁰⁾年轻的傅吾康不仅从中国讲师那里学会了汉语口语，也学会了用毛笔写字。

两个学期的基础阶段的学习，为傅吾康的汉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便进入了专业学习阶段。在汉堡，著名的中国哲学史专家佛尔克正开设“孟子”课。佛氏的中国哲学史造诣颇深，对其三卷本的巨著《中国哲学史》，中国学者方志渊推崇备至。他认为，跟佛尔克的著作相比，即便是日本或中国学者的哲学史英文著作也是难以望其项背的。¹¹⁾这一学期的课，真正让傅吾康认识到中国古代思想的伟大，他后来写道：“佛尔克教授特别善于从现有的一篇文章出发，并由此带领我们畅游于中国古代思想的世界。”¹²⁾

当时正值福兰阁的巨著《中华帝国的历史》的第一卷出版。¹³⁾颜复礼让每一个学生以此书的内容为依据作专题报告，之后进行讨论。这也为后来傅吾康的中国历史研究打下了基础。

当时在汉堡，不仅是研究汉学，研究日本学的人数也很有限，因此这两个专业在被称作“幽兰专业”(Orchideen-Fach)。两个专业的学生加在一起也不超过20人。

除了在大学上课之外，傅吾康也第一次结交了一位中国朋友——孙用震，他是曾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1867-1931)的公子，当时出任中国驻汉堡的副领事，他有时也到汉学系参加那里组织的研讨班。他们之所以成为朋友，也是跟他们两家的世交有关：孙用震的父亲孙宝琦曾于1907-09年任柏林中国公使馆公使，当时福兰阁曾在公使手下任参赞。

1931年福兰阁退休了之后，才允许儿子从汉堡转到柏林就读。到了柏林之后，傅吾康首先就读于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以便将自己的汉语口语操练得更纯正。当时在语言学院担任讲师的是许勒教授，他曾多年在中国传教，也是卫礼贤的好朋友。许勒为人友善，尽管他的课不那么吸引人，但却很有系统性，课上课下他一再表现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理解与同情。

1932年7月傅吾康在东方语言学院通过了文凭考试，在成绩单上对他的评价如下：

该考生在不是很容易的由中文文言文译成德文的语言考试中，获得了“及格”的成绩。在将同一篇文字翻译成汉语口语的考试中，成绩为“良好”。而在将一篇德文文章译成汉语口语的考试中获得了“及格”的成绩。

他有关“中国农业及农业问题概况”(Grundzüge der Landwirtschaft und der

10) Schang Tscheng-Tsu, *Der Schamanismus in China. Eine Untersuchung zur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wu“*, Hamburg 1934 (Dissertation).

11) 方氏列举了日人铃木的《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的《先秦名学史》、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英译本)以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英译本)之后指出：“以上这些翻译本的哲学史，有的是失之太简单，有的根本没有取材于中文原书，原不及德国硕儒之取材丰富，叙述流畅。”见方志渊“佛尔克教授与其名著中国哲学史”，载《研究与进步》第一卷第一期(1939年4月)，第36页。

12) 出处同注1，第31页。

13) Otto Franke,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Berlin: de Gruyter 1930.

Agrarfrage in China) 的笔试, 显示了该考生对这一题目良好的常识。至于进一步的内容, 他却知之甚少。因此只能获得“及格”的成绩。

在口试中, 考生翻译了一篇中等难度的汉语文言文, 用汉语口语交谈以及实际运用均有“较好”的知识。综合以上笔试和口试的成绩, 考试委员会特授予哲学系学生傅吾康以文凭证书。他的整个考试成绩为“好”。¹⁴⁾

尽管以今天的眼光看来, 这样的成绩对后来作为汉学大师的傅吾康来讲可谓是差强人意, 但在当时, 已经是得之不易了。

在柏林大学的汉学系时, 傅吾康经常参加由西门华德组织的各类课程。那时西门任大学图书馆的馆员, 同时也是汉学系的候补教授。¹⁵⁾ 他从《聊斋志异》和《庄子》中选出了一些材料给学生作古汉语语言方面的训练。尽管直到那时西门还未到过中国, 但他的课却很生动, 也很有启发性。

1933年, 跟随斯文赫定的探险队在中国西北地区做考察工作三年的雷兴回到了德国柏林, 并在大学教授佛教课程, 包括梵文、巴利文、藏文和蒙文, 傅吾康对这些研讨班也都很感兴趣。后来他在谈到他的这位老师时还说, 他的大部分佛教知识基本上都是从雷教授那里得来的。

纵观傅吾康在汉堡和柏林的求学阶段, 举凡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的课程无不涉猎。清人玉琬尝言:“善读书者, 始乎博, 终乎约”, 也就是说学习者在开始阶段应广泛阅读、涉猎, 务求扩大自己的事业, 但其目的是要最终有所侧重。基础阶段的博览和博士阶段的专攻, 都为傅吾康后来的明清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三、攻读博士及最初的学术准备

1934/35年冬季学期, 傅吾康在柏林完成了他的学业, 之后他作了继续读博士的选择。因为他不愿意在柏林大学跟海尼士读下去, 因此选择重新回到汉堡大学。在那里已经做了教授的佛尔克很乐意地接受了傅吾康。博士论文的题目“康有为及其学派的国家政治革新尝试”是受1934年福兰阁建议他写的一篇论文的影响, 他想在此基础之上予以扩展、加工。

佛尔克尽管是中国哲学史大家, 但他讲起课来却异常枯燥、乏味。按照当时汉堡大学的规定, 所有大学的正式教授每个学期都必须举办一次一个小时的公开讲座, 其对象不只是大学生, 而是面向所有公众。跟其他热门学科的教授不同, 佛尔克的讲座每每被安排在很小的教室中。他在冬季举办的这类讲座, 来听讲的人当中有些只是想临时到室内暖和一下而已, 因为他们进来之后不到10分钟就被佛教授索然寡味的报告给讲得睡着了。¹⁶⁾

14) 出处同注1, 第36页。

15) Privatdozent, 以往译作“无薪讲师”, 系已经取得教授资格而无教授席位的“候补教授”。

16) 出处同注1, 第45页。

在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傅吾康发现，康有为的政论文章对一位刚从汉学系毕业的学生来讲毕竟是很难理解。他先后与在德国学习日耳曼学的学生如陈铨（1903-1969）、历史学家张贵永（1908-1965）等进行过语言交换，也正是在德国和中国学者的共同帮助下，傅吾康顺利地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1934年的圣诞节之前他将博士论文正式交给了考试委员会。

在1935年1月由佛尔克教授主持的口语考试中并没有过多地纠缠于中国哲学的话题，而是提了一些一般性的问题。因此，傅吾康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考试。

他的博士论文被评为“好”，这个成绩实在没有低估傅吾康的论文水平。后来他在重新阅读这篇论文时，认为，从材料和文本分析上来讲，尚可；但在许多细节方面处理得实在欠妥。¹⁷⁾ 不过不久这篇论文还是在《东方语言学院通讯》上发表了，¹⁸⁾ 并且赢得了众多的书评，甚至像莱顿的戴闻达教授也亲自在《通报》(T'oung Pao)上撰文评价此书，¹⁹⁾ 这对年轻的汉学家傅吾康来讲，的确是极大的奖掖。

博士考试之后，傅吾康开始为将来的学术生涯作准备工作。他买来卡片柜，开始按照字母顺序对他所藏的汉学著作和论文篇目进行编目并做提要。后来他甚至将他父亲卡片的一部分也纳入了自己的卡片系统之中。他保持着这一做学问的习惯直到去世之时。

1935年2月傅吾康又回到了汉堡父母的家中。这时的福兰阁尽管已经退休在家，依然忙着著述，特别忙于他的《中华帝国的历史》的写作。在此不久前，胡适出版了《说“儒”》的小册子，福兰阁认为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论著，因为一反“五四”时期其他学者的看法，通过对可信的史料的论证和解读，胡适认为，孔子不仅不是一个复辟的保守者，而且是一位革新家、革命者。福兰阁建议傅吾康翻译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后来这篇发表在《汉学特刊》(Sinica-Sonderausgabe)上的译文，²⁰⁾ 甚至直接影响到了20世纪德国哲学大师雅斯贝尔斯的观点。²¹⁾

四、初抵北平

1936/37年在服完了一年的兵役之后，傅吾康在柏林作去中国的准备工作，1937年3月28日他离开了柏林去了不来梅，从而开始了他50多天的旅行，并于同年5月18日抵达了上海。说什么他也没有想到，这一呆就是整整十三年（其中只有短期在日本逗留）。在他父亲的诸多朋友、

17) 出处同上，第46页。

18) Wolfgang Franke, „Die Staatspolitischen Reformversuche K'ang Yuwei's und seiner Schule. Ein Beitrag zur geistigen Auseinandersetzung Chinas mit dem Abendland“, in: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zu Berlin*, 38 (1935), S. 1-83 (Dissertation).

19) Duyvendak, in: *T'oung Pao* 33 (1937), S. 95-100.

20) Wolfgang Franke, „Der Ursprung der Ju und ihre Beziehung zu Konfuzius und Lau-Dsi' von Hu Shi“, in: *Sinica-Sonderausgabe* 1935, S. 141-171; 1936, S. 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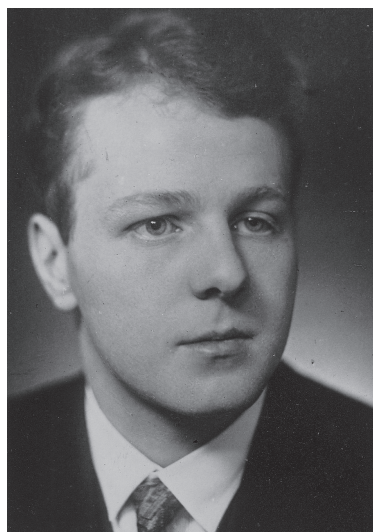
21) 请参考李雪涛文“论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观念的中国思想来源”，原文载《现代哲学》2008年第6期，第86-96页。

学生的帮助下，他终于在5月31日来到了他父母居住过多年的北平。

抵达北平之后，傅吾康从火车站直接就去了位于北城的中德学会（Das Deutschland-Institut）。中德学会坐落于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中，有庭院，但唯独缺个西厢房。有意思的是，素昧平生的北平，对傅吾康来讲并不陌生：“我感到前世已经在这里生活过了，从一开始便有家的感觉。”他后来回忆道。²²⁾他来到北平的第二天就买了辆日本产的自行车，一直骑到1946年他离开北平去成都任教。

来到一个新的地方，第一件事当然是要拜访以往的熟人和朋友了。傅吾康也不例外，来到北平之后，他就去了清华，见到了他在柏林时的老相识陈铨。这时的陈铨已经是清华德文系的教授了，后来也成为了名噪一时的“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同样是在清华大学，傅吾康还拜会了在德国留过学，也听过他父亲课的陈寅恪教授（1890-1969）。而他父亲的另外一个学生、元史专家姚从吾（1894-1970）则在北大跟傅吾康见了面。他们在一起愉快地回忆起从前在德国的学业和生活。

1937年初，刚刚去世的蒙藏佛教专家、梵文学者钢和泰留下了许多的图书，他的侄子René具体负责整理这批文献。René是在一战后由波罗的海诸邦（Baltikum，今爱沙尼亚及拉脱维亚之地）逃往美国的，后来又从美国辗转来到北平。由于他不懂中文，而钢和泰所遗留下来的书中又有很多是中文的，这样就由艾锺风推荐，傅吾康负责整理其中中文部分的书籍。傅吾康每周骑自行车两、三次前往钢和泰生前居住的奥匈使馆。由于钢氏系著名的佛教学者，他的中文书籍大都跟佛教有关。当时因为有了南条文雄（1849-1927）译补的《大明三藏圣教目录》，²³⁾对傅吾康来讲大部分佛经篇名的录入并不成什么问题。



1937年左右的傅吾康

五、中德学会

中德学会的前身系德国研究会（Deutsche Studiengesellschaft），是由留德学者郑梦麟博士发起成立的一个旨在促进中国学人对德国文化进行了解和深入研究的学术机构。这一学会实际上

22) 出处同注1，第59页。

23) 本目录的英文标题为：*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 by Bunyu Nanjio*, Oxford, 1883. 该书系南条文雄在留学英国时，将日本黄檗版大藏经所收之大明三藏圣教目录进行翻译，并对经籍目录作汉、梵、英译音对照。后来成为欧、美汉译大藏经研究者之指南。

是想与设在法兰克福、由汉学家卫礼贤于1925年创立的中国学院（Das China-Institut）形成互动之势。

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希特勒在国内的政策也影响到了北平。1934年，原任会长卫德明辞去了会长一职，主要是由于他妻子玛丽亚是犹太人的缘故。因为中德学会之所以能有效运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柏林外交部在财政上的支持。如果让一个其妻为非雅利安人的人继续担任会长一职的话，那学会很可能再也得不到帝国在财政方面的资助了。卫德明辞职之后，学会于1935年5月召开董事及会员大会，决定更名为中德学会，并推举谢理士和曾留学海德堡的中国学者冯至（1905-1993）分别担任德中方会长。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中日之战在华北平原掀起了序幕。不久，华北战火连天，北京早已沦陷在日本军管之下。大部分在北平乃至周边各大院校、机构任职的学者纷纷离开了华北。“中德学会”因属德国在华的文化学术机构，而德国跟日本、意大利同为轴心国，自然受到日本人的保护。

1937年10月，傅吾康被正式聘为中德学会的职员，月收入为80元。²⁴⁾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长他几岁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索尔茨。索氏系艾鐸风的老朋友，他曾在艾氏在北平的房中住过一年之久。1938年9月索尔茨回到德国之后，在外交部供职。正是他极力说服政府为中德学会增加投入。1944年7月20日在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后，索氏惨遭纳粹的杀害。

1938年，作为会长的谢理士携妻回德国休假，本打算一年的时间，没想到却病逝德国。自谢理士回去之后，傅吾康实际上就独自担负起了中德学会的会务工作。而在他身后则有艾鐸风以及对中国的情况既了解，又关心的德国使馆住北平办事处主任彼德尔博士。彼德尔博士曾是傅吾康在柏林东方语言学院毕业文凭考试委员会的成员，因此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师生关系。

直到1940年3月傅吾康才辗转得知会长谢理士博士已于本年2月11日在德国病逝的消息。后来在傅吾康的建议下，自1940年8月1日起，福克司开始担任学会的会长一职，他的工作主要是对外代表该学会，而所有的学会日常工作（包括杂志等编务）统统还是由作为德方常务干事的傅吾康来承担。

自1940年4月1日起，顾华代表一直不在北平的冯至，担任了中德学会的中方常务干事一职，在他的推荐下，中方秘书长由祝钟担任。

1941年在德方会长福克司的领导之下，中德学会的工作一如既往，展开得非常顺利。因福克司受聘于慕尼黑大学，拟返德任职而辞了职。因此在1941年8月罗越接替了他担任中德学会的会长一职，但后来由于战争的缘故联系中断，福氏并没回成德国。作为新会长，罗越的主要工作是对德方的政府机构，而对中方的事情他并不关心，他将大部分的工作留给了傅吾康，从不作更多的交待。而傅吾康也没有办法像跟福克司一样跟罗越谈所有出现的问题。罗越的原则是只对德国的官方负责，凡是有可能引起争执、批评的事情，他一概不主张去做。他也不再出版中德学

24) 当时在北平每天的日常花销约为1元；雇佣一个佣人的费用为每月18元；一位中文教师每周5次，每次1小时，共20元。——出处同注22。

会的年鉴了，而在这之前，年鉴的出版已经形成了惯例。²⁵⁾

由于增加了德方的工作人员（霍福民、罗越以及马丁的加入），帝国的外交部也增加了对中德学会的预算投入，他们得到的是用当地货币支付的款项。由于是会长，也由于其地位最为重要，罗越理所当然地拿最多的工资；霍福民就少多了，但依然比傅吾康多，马丁就更少了。而此时的福克司则拿他的退休金，还算够用。后来傅吾康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后来来了三位德国新同事，但真正减轻我的工作负担的，却是新来的中国同事。”²⁶⁾

抗战开始后，原任中德学会会长的冯至教授随北大离开了沦陷区，去了西南大后方。因为没有迹象表明冯至会在近期回到北平，重新出任中方会长一职。德方非常希望中方能够推举出一个与德方具有相同权力的会长。艾鐸风推荐了杨宗翰（1901-1992）。杨氏在学术方面极有造诣，又具有领导才干，因此非常适合这一职位。自1943年起，他被推举为学会的中方会长。自杨宗翰来学会工作以来，在这里聚集了众多的中国社会名流。杨宗翰的工资比德方会长低得多，他自己也明白他的职位基本上是象征性的。实际上自1938年底，所有的权力实际上都掌握在德方手中，此时是由罗越来具体决定财权和支出的费用。杨宗翰跟罗越一样，每周两三次到学会来，也就呆几个小时的时间。尽管他绝不主动建议做一些事情，但他却能听进各种意见，每当中方人员有问题找到他时，他或者依据自身的阅历和经验作出解释，或者提出一些他的卓见。他也注意到了傅吾康跟其他德国同事间的微妙关系，总是力图用他的权威设法保护傅吾康，当然他对其他德国同事也是非常尊重的。

1944年初杨丙辰（1892-?）在安定门内板厂胡同7号发现了一个较大的四合院，很适合已经扩大的中德学会的新规模。3月间学会便搬到了新的地址。而在此之前，霍福民早于1943年底就迁至了南京，并供职于那里的德国使馆。在南京期间，霍氏曾与女摄影家赫达·莫里逊一起出版了画册《南京》（*Nanking*），介绍南京及周边早已不复存在的景物的历史。当时也有人劝傅吾康去南京，但他不愿意改变书生的本性，拒绝了去南京牟取政治资本。1944年6月27日在新的会址举办了会员和董事会年会，这也是中德学会的最后一次年会。

1945年3月杨宗翰向罗越和傅吾康提出辞去中方会长之职，5月8日欧洲战事结束，中德学会也不再有德方在财政方面的支持。8月12-17日，罗越和傅吾康将中德学会所有财产的清单以及剩余的款项都转交给了杨宗翰，由他负责。所有德方工作人员此时都已隐退，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战争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战胜国，敦促中国政府遣返战争期间在德国政府分支机构任过职的德国官员、纳粹党员、新闻出版界的人士以及在德国企业中任过要职的其他德国人。在1946年5月所公布的将要被遣送的名单中，跟傅吾康关系比较密切的汉学家就有：宾格尔、福克司、海西希、霍福民和罗越。

25) 从中德学会创立至此时，学会已经出版了7本年鉴（1933年至1941年），1本《北平中德学会会务概况》。见本文“附录一”。

26) 出处同注1，第115页。

1946年8月13日傅吾康被召回了中德学会，跟四位从后方来的学会成员共同商量解散后学会之归属问题。这四个人分别是：当时任南京国立图书馆馆长的蒋复璁博士（1898-1990），他曾公费到德国柏林大学进修图书馆学，那时他跟傅吾康就认识了；曾任中德学会会长的冯至，当时任北京大学德国语言文学教授；毛准（子水，1893-1988），北大教授，图书馆馆长；以及在柏林时傅吾康就认识的、他父亲的学生姚从吾（士鳌，1894-1970），当时他已经是北大历史系的教授了。商谈的结果是中德学会最终划归给由袁同礼（守和，1895-1965）任馆长的北平国立图书馆，并继续聘请刘东元对学会（主要是图书馆）进行管理。²⁷⁾

六、丛书编辑

学会除了受使馆的委托做一些展览，如1938年10月在中央公园举办的“过去和当代德国木刻展”（Der Deutsche Holzschnitt i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之外，傅吾康的真正兴趣还在于组织、编辑“德国文化丛书”及其出版。由于组织翻译得非常及时，丛书基本上都是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在预计的时间出版的。

1938年5月王锦第（?-1983）从日本回北平，不久就与傅吾康交上了朋友。他从英文翻译了《今日德国教育》一书。

1941年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部的曾一新也成为了编辑部的一员，他的德语是通过自学而来的，偶尔也为学会翻译一些东西。他是资深编辑，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后来中德学会丛书之所以能顺利地在商务出版，并在商务在北平的印刷厂——京华印书局印制，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曾氏。至1945年8月中德学会解散，共出版“中德文化丛书”21册、“中德学会特刊”8卷。²⁸⁾

较晚些的时候，辅仁大学史学部主任张星烺教授（1889-1951）也加入到编辑队伍中来，他曾在德国哈勒大学学习过生理化学，后来由于患有严重的肺病，便承袭家学而转向史学！特别是他通过搜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而编纂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书，在学界颇有名气。他满头白发，和蔼可亲！

七、杂志编辑

王锦第曾建议傅吾康创办一本介绍德国当代学术成就的刊物。福兰阁跟当时帝国学术通讯中心的主任、《研究与进步》（*Forschung und Fortschritt*）的主编克和夫博士的关系非常密切，正是由于这一层关系，中德学会也收到每一期的杂志。该刊发表德国专业学者有关自然科学与社会

27) 据说，“中德学会的藏书和有关资料，稍后完整无缺地移交给国立北平图书馆。1949年后，又全部转给北京大学图书馆。由于保管不善，藏书和资料的缺损不少。”丁建弘、李霞：“中德学会和中德文化交流”，载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65-289页。此处引文见：第283页，注2。
28) 见文后附录一“中德学会出版的丛书和单行本一览表”。

科学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出版相同内容的英文版 *Research and Progress*。福兰阁本人也给该刊撰写有关德国汉学的文章。傅吾康向克和夫建议由中德学会在中国组织编译出版中文版季刊《研究与进步》。之所以不在众多的其他德文期刊中搜罗优秀的论文，是因为当时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学术力量，同时《研究与进步》也出版英文版，这样找译者就相对比较容易。

出版这样的一份杂志，在当时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起初傅吾康一直是通过谢理士将信转给克和夫博士的，不过谢理士对创办这样的刊物并不感兴趣。他在给傅吾康的信中对此直言不讳：

……我很欣赏您的工作热情，以及如此庞大的工作计划。但您要面对现实，不要以美国式的速度来行事。慢点做事总比回过头来修正要好得多……。您可以出版这样一本杂志，不过我不认为它有什么重要。您应当清楚，您会因此而负担许多的工作。这有时，比方说在夏天会是很烦人的。对于这样的工作我们缺人手，这些人我们必须专聘，对他们负责。订户您也完全没有，无论如何，我们是先还要问一下外交部的意见。²⁹⁾

外交部很快便同意在中国出版《研究与进步》了，翻译费用、印刷费用也马上得到了落实。1939年4月第一期刊终于得以出版，并且在德国也得到了认可。据福兰阁的说法，当时日本人甚至也想仿效此法，在日本出版日译本。³⁰⁾

开始时，学会杂志社编辑部仅有两位编辑：杨丙辰和董敦（董遂曾）。后来加入的方志滂（Achilles Fang）和顾华两位编辑，受到了傅吾康的高度赞扬，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研究与进步》才得以连续出版下去。方志滂除了在中德学会编辑刊物之外，也在《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编辑部协助丰浮露的工作。方氏系朝鲜族，在语言和文史知识方面颇有才华。他在幼年时就学会了朝鲜语和日语，后来在中学和大学里，他的古代汉学被训练得炉火纯青。他在清华求学时，曾是艾愕风的弟子。此外他还能熟练运用英文、德文、法文等多种西方语言，能阅读拉丁文和古希腊文。在《华裔学志》编辑部他的主要工作是校阅并更正从中文翻译成西文的文章，他当然发现了很多译文的错误。而在中德学会的编辑部，他的工作刚好相反，审校从西文翻译成中文的文章。顾华则是一位语言天才，不光是他的德语，他的其他语言知识也大都是通过自学而来的。

自1940年顾华任中方总干事以来，学会已经将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作为了一来对待。当时的编委会除了傅吾康之外，德方只有福克司，中方则有方志滂、顾华和杨丙辰。同样在这一年，编委会决定将杂志名称改为《中德学志》，德文名为：*Aus deutschem Geistesleben*（意为：来自德意志精神生活）。改名后的杂志同时放弃了自然科学方面的译文。新版的内容包括以下四个部分：一、论文。不仅有译文，亦包括中国学者撰写的有关德国思想的学术、历史等的文

29) 出处同注1，第80页。

30) 出处同上，第80页。

章；二、文学艺术；三、研究与进步；四、书评。

八、在北平的汉学家圈子

柳宗元在《师友箴》中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对于年轻的汉学家傅吾康来讲师友也是至关重要的。从沈阳来北平定居的福克司，后来真的成为了傅氏的良师益友。在此之前，福克司曾有12年的时间（1926至1938年）任沈阳医科大学德文讲师。当时辅仁大学给他提供了一个教授的位子，希望他能出版耶稣会士地图集。³¹⁾ 福克司来到北平之后，从1938年12月起被安排在了中德学会的客房里，直到第二年的7月他在宽街附近找到了自己的住宅为止。实际上早在福克司正式来北平定居之前，傅吾康就在艾锷风的家中见过他好多次，他每次到北京都住在艾氏家中。只不过至此他们之间没有比较密切的接触而已。³²⁾后来傅吾康回忆道：

如果没有他（福克司——引者注）的支持的话，我很可能会放弃中德学会的工作。他一直支持我进行汉学研究，尽管我写过博士论文，也有博士的头衔，但真正启发并引导我进行系统汉学学术研究的是福克司。因此我亦将他看作是自己的老师。我在1940-45年间所有的汉学方面的论文，都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写成的。如果没有他的劝告和帮助，我就不会获得那么多文献学方面的知识，并建立起自己的图书馆。……当然，作为一位年长于我的朋友，他对于我个人的帮助绝不仅仅局限在汉学方面。³³⁾

也是福克司让傅吾康认识到了对于一位汉学家来讲，日文文献的重要性：“我们又必须指出西方汉学家凭借着他们那广博的书籍史的智识能够充分利用日本汉学家们所成就的汉学研究的结果为数是不多的。福克司便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位。由福克司著作中，可以看出来，他所研究的一切汉学问题，凡是与其有关系的日本文章，必不被他所忽略。”³⁴⁾后来也是在福克司的启发下，傅吾康撰写了介绍德国年轻一代汉学家的论文：“德国青年汉学家”发表在《华裔学志》第五卷（1940年）上。

曾担任中德学会德方会长的谢理士在德国获得过图书馆学博士学位，他于1930年到辅仁大

31) Walter Fuchs,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mit Namensindices für die Karten der Mandschurei, Mongulei, Ostturkestan und Tibet mit Wiedergabe der Jesuiten-Karten in Originalgröße*, Peking 1943. 相关的书评见：《中德学志》第6卷1-2期（1944），第331-334页。

32) 现存有1938年10月28日、11月22日以及11月23日福克司致傅吾康的三封信，第一封是有关购书的事情，第二、三封是有关他从沈阳搬到北平的安排等事。见Hartmut Walravens, „Zur Biographie des Sinologen Walter Fuchs (1902-1979)“, in: *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177-178 (2005), S. 117-149, hier 134-135。

33) 出处同注1，第83页。

34) 傅吾康著、胡隽吟译“德国青年汉学家”，见《中德学志》第三卷第一期（北平1941年3月），第78-91页，此处引文见第81页。



1939年在北平的汉学家与中国学者的合影，自左而右依次为：方志澐、傅吾康、Woelters、法国出版商Vetch、Hope-Johnston[?]、杨宗翰、Francis Cleaves、艾锷风（手里抱着他家佣人的孩子）、艾锷风家的佣人、卫德明

学，自1933年起担任辅大的图书馆主任，教授德文和欧洲文学史。除了不同的行政工作之外，他在汉学方面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的书籍史和图书馆学，并有研究论文如“中德两国印刷之发轫”、³⁵⁾“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明朝的文渊阁”以及专著《现代中国图书馆概况》等。³⁶⁾

曾接替卫礼贤担任法兰克福中国学院院长的鲁雅文教授也于1939年春、夏在北平逗留了几个月之久，傅吾康有时在中德学会，有时在其他场合跟他见面。鲁雅文一度想在北平留下，希望在接替彼德尔的德国使馆驻北京办事处新主任诺尔特的协助下，接管中德学会。后来部分是由于傅吾康的反对，才没能成功。傅吾康不无道理地认为，在谢理士当时回德国度假期间，做这样的决定哪怕是临时的也是不合适的。

除了工作和研究之外，傅吾康从1939年秋季开始，也在辅仁大学参加由司徒资教授用英文开设的历史研究法的研讨班，系统地学习了欧洲的历史研究方法论。司徒资系莱比锡大学历史学博士，曾在美国十年，以用德文撰写美国史而闻名后，回德国任科隆大学历史学教授。之后来辅仁任教多年。

在傅吾康的建议下，1940年底，霍福民和罗越，1941年6月马丁从德国来到北平，加入到

35) E. Schierlitz, „Anfänge der Druckkunst in China und Deutschland“, in: *China-Dienst* III, 2, Shanghai 1934. S. 100-104 mit 6 Abb.。

36) Ders., „Zur Technik der Holztypendrucke aus dem Wu-ying-tien in Peking“, in: *Momumenta Serica* 1 (1935-1936), S. 17-38; Ders., „Das Wen-yüan-ko der Ming-Zeit. Materialien zu einer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Palastbibliotheken“, in: *Monumenta Serica* 3 (1938), S. 528; Ders., *Das chinesische Bibliothekswesen der Gegenwart*, (Zentralblatt für Bibliothekswesen), Jahrg. 54, Heft 3, Verlag O. Harrassowitz 1937.

了中德学会的阵营。霍福民是傅吾康的老同学了，早在柏林时期他们俩就认识了，后来在汉堡他们成为了朋友。再后来霍福民加入了纳粹，并且是一个党的积极分子。在到北平之前，他所热衷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生活，翻译了大量的当时的中国学者在学术方面的成果。傅吾康写道：“现代中国学者们作出了许多研究工作，这个对于西方的汉学研究是很重要的。曾经把他们的著作译成德文或加以评注的工作，这种光荣应当归于霍福民氏（北京中德学会研究员），他不仅将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的著作译成德文……。”³⁷⁾不过，到了北平之后，霍福民对当代中国的学术和时局不再感兴趣，开始痴迷中国传统的词和元曲。据傅吾康回忆，霍福民离开德国的时候，还没有提交博士论文，不过由于战争的缘故，他已经提前完成了博士考试的口试部分，这通常是整个考试的最后一部分。因此，他一到北平就开始使用博士头衔是很成问题的。不过，霍福民却很有音乐天才，他能用风琴演奏出一流的乐曲。令傅吾康始料未及的是，霍福民的兴趣显然不在中德学会，倒是“德国同乡会”和纳粹党部的工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来。他在党部负责政治教育和希特勒青年团的工作。而在中德学会他的工作基本上被限定在报告会或跟音乐有关的活动方面，有时他也代些德语课，学会只是按小时付给他课酬而已。

罗越曾在东亚艺术史和汉学专业获得过博士学位，并在慕尼黑的博物馆工作过。他在学术方面的兴趣是中国的考古和艺术史，在这些方面的著述也颇丰。他来北平的时候已经结过婚了，并且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很平易近人，很高兴能到北平进一步从事研究工作，不过他对中德学会的工作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尽管他后来接替福克司作了学会会长。

在非汉学领域，罗越和霍福民共同出版了一本当代德国诗人冯·席拉赫的德文诗选——只有德文原文，没有任何评论，也没有中文翻译。席拉赫是当时纳粹的著名诗人，不过在北平出版这样一本纯德文的诗集，以表示对纳粹极权之厥角稽首，傅吾康认为此举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第三位来北平的德国汉学家是马丁女士，她父亲自1933年起在广州做医生，因此也引起了女儿对中国的兴趣，她母亲是美国人。她在柏林从海尼士学习汉学，也是在来中国前做完博士口试的。跟霍福民不同，到中国后不久，她就寄回了博士论文，从而完成了整个博士学位的程序。马丁比傅吾康还年轻几岁，也不是纳粹党员。但她人太幼稚，在北平很快便成为了“德意志少女联合会”（BdM-Bund deutscher Mädel）的小头目，这是女性希特勒青年团的组织。跟罗越和霍福民比较，马丁最有兴致跟中国人交往，有时也参加中德学会的一些工作。她曾参与了《德华常用小字汇》（*Kleines Deutsch-Chinesisches Wörterbuch für den Anfang*）第二版的修订工作。这本小辞典最初是由傅吾康跟在汉堡时就成为他好朋友的孙用震合编的。

在北平中德学会的汉学家圈子里，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位新来的德国汉学家之外，还有很多天主教的神父们。跟海尼士在柏林写过汉学博士论文的就有：圣言会奥地利籍的叶德礼，当时任《华裔学志》的编辑，以及两位方济各会的神父：Beatus Theunissen和Hermes Peeters。再加上在中德学会的四位元老：艾鐸风、福克司、卫德明和傅吾康，也有10几个之多。从1941年起，他

37) 出处同注34，第85页。

们每个月在其中一个人家中聚会（暑期除外），谈一些专门的话题。之后自1943年2月起，他们在福克司家中每个礼拜举办一次类似汉学研讨班性质的活动，他们在一起读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并一字一句地将其翻译成德文。当时经常光顾的有5-6人，艾锷风的兴趣因为在艺术史方面，他的专业也与中国文学相差甚远，因此从来不参加。卫德明和霍福民也不来，他们认为，自己的水准早已远远地超出了这些，不屑参加此类的基本训练。傅吾康后来承认道：“我则在逐字阅读并翻译成德语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特别是我后来当了大学教师之后，尤其感受到了这一点。”³⁸⁾

福克司和卫德明渐渐由于不同的治学风格而越来越疏远，关系变得愈来愈糟。福克司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家，研究范围严格限定在自己的领域：清初的历史，特别是满族居住区、蒙古，满文文献，中国地图史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内容。在他的出版物中，他特别强调彻底的语文学和文献学工夫。早在1940年傅吾康就认为：

他（指福克司——引者注）不只是位生产最多的学者，并且他的作品和所取的资料也是最有原始性的。差不多在他发表的每篇文章中，都把握着新的问题，发现出新的领域。并且常常都是些尚未被欧洲人们所注意到的，也是从来未被中国和日本的汉学家们所注意到的。³⁹⁾

给普通大众读的，综合性和一般性的文章，他是不做的。他的文章和专著只写给专家来阅读。在这方面伯希和是他的典范。卫德明则刚好相反，尽管他也有很细致的研究，大部分也是有关清代早期历史的，并且编有《德华词典》，⁴⁰⁾不过这些都不是他的主要方向。他更愿意在大的汉学范围内做综合性的文章，而并不一定要深入其中，或对这一题目有新的思考。傅吾康在“德国青年汉学家”一文中对卫德明的研究领域的界定也颇费了一番功夫，他就此写道：“卫德明氏（北京中德学会讲师）所出版的著作，除了研究中国的法理学及中国精神的和社会的历史及翻译中国近代文学短篇著作之外，在汉学研究中他是第一个创始去研究哲学家及政治家顾亭林的人……。”⁴¹⁾当时哈斯博士住在北平，他在1937年以前一直在外交部门任职，后来由于他妻子祖辈的犹太血统，而遭解职。之后他作为涂料产业工会（IG Farben）的经济-政治方面的顾问常住北平。1943年在他的家里也经常举办一些有关汉学的报告会。其中卫德明做了一系列有关《易经》的报告，不久这些报告便以《易经八论》的书名结集出版，⁴²⁾这本小册子后来成为了西文中流传最广的《易经》入门书。⁴³⁾后来福克司曾不无尖刻地说，卫德明“从汉学家转到了政论家”。罗文达当

38) 出处同注1，第120页。

39) 出处同注34，第79页。

40) Hellmut Wilhelm, *Deutsch-Chinesisches Wörterbuch*, Shanghai 1945.

41) 出处同注34，第84页。

42) 德文版：Hellmut Wilhelm, *Die Wandlung, Acht Vorträge zum I Ging*, Peiping 1944.

43) 英文版为：Hellmut Wilhelm, trans. by C. F. Baynes, *Change, Eight Lectures on the I Ching*, NY:

时也偶尔去听听卫德明的报告，他也讽刺地戏称此类的报告会是“相互吹捧俱乐部”。⁴⁴⁾

在福克司家举办的汉学研讨班一直持续到1944年的3月份，此后便不再举办了。这之后，德语国家的汉学家们也不再举办什么定期的活动了。

1942年的时候，蒙古学家海西希的到来，使在北平的德国汉学家的圈子又得以扩大。他是从东北辗转来到北平的，之后住在艾锷风家附近的一个四合院中，在那里傅吾康和王锦第曾在1939至1940年一起住过。海西希对蒙古研究充满了激情，很快便跟福克司联系上了。他们俩的很多研究领域都是交叉的，后来海西希也在《汉学集刊》上发表过论文。

福克司注重细节的研究，理解专业的学术话语，除了专题性的研究之外，也很少做宏大叙事式或很一般性的演讲。但他有时又不得不做一些妥协。1942年4月14日他在德国使馆作了一场有关中国地图学的报告，对于大部分是外行的听众来讲，依然是极具启发性的。傅吾康当时刚刚30岁，不太善于辞令，也特别害羞，当使馆给他安排报告

时，他真的不知如何是好。他周围的朋友们都来劝他，劳琛给他建议说，让他将已经写好了的报告先在他家预讲一次。傅吾康乐意接受了。之后朋友们给他提了一些建议，这样，他便能在毫不胆怯的情况下作了一场有关“中国的国家观念”的报告，这实际上是在重复他父亲的一些观点和内容。第一场被安排在天津，之后在上海，最终是1943年4月21日在北平。

上文提到的燕京大学的罗文达博士，他出生于什未林（Schwerin）的一个犹太家庭。1930年在柏林大学新闻学专业博士毕业之后不久，罗文达就预见到了纳粹德国将要出现的灾难，及时离开了那里。来到北平之后，他在燕京大学谋得了一个讲师的职位，并取得了中国国籍。他人很谦虚，友好，特别容易让人接近。他在北平北城找到了一个很简单的住处，很快便跟傅吾康、福克司以及卫德明一家交上了朋友。傅吾康认为，由于罗文达没有受到很好的学术训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不过他所做的一切都很扎实。1943年7月傅吾康还跟罗文达一道骑车去通州看了李贽（1527-1602）的墓碑。

后来由于罗文达在经济方面困难重重，在北平的生活都成了问题。为了能够帮助他，傅吾康在征得了福克司和海西希的同意后，交给了罗文达一个以学会的名义资助的研究项目。因为罗文达的俄文很好，而他们三个却对俄文只略知一二，或根本就一窍不通，翻译出俄文文献中有关蒙古-中国关系的研究论文，特别是明代的，对他们三个的研究来讲都很有意义。鉴于此，罗文达



北平时期的德国汉学家福克司与艾锷风

Pantheon Books, 1960.

44) 出处同注1，第137页。

翻译了卡扎克维奇的论文“中国军队远征蒙古史的文献来源”。⁴⁵⁾ 不仅仅是俄文的论文，俄罗斯著名汉学家璞科第的著作也由罗文达翻译出版了。璞科第在19世纪80年代末在北京任沙俄的外交官，后曾担任华俄道胜银行董事，由于有着共同的汉学研究兴趣，他跟福兰阁成为了朋友，一直到1954年傅吾康整理出版他父亲的回忆录时，才晓得这段以往的友情。

1939年以后，有很多的美国汉学家来到北平，特别是哈佛选送了很多学生到北平学习。美国汉学家贾德纳也正是从这年起，每月邀请所有在北平的西方汉学家们到他家中聚会，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在柏林跟随海尼士教授写过博士论文的德国和比利时的神父们，如圣言会的叶德礼，圣方济各会的Hermes Peters和Beatus Theunissen。这样的活动，确实扩大了傅吾康的汉学圈子。

1941年初傅吾康在艾愕风家中认识了荷兰的外交官、汉学家高罗佩，他当时在北平仅作短暂逗留。长期居住在北平的有1941年春季和夏季来这里的拿哈佛奖学金的美国人海陶玮，他是文学理论家，以及罗越的邻居、芮沃寿和芮玛丽夫妇。因为芮玛丽本人做清史研究，他们夫妇很快跟福克司交上了朋友。后来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这些美国学者作为日本人统治下的战争敌人而处境险恶，不久这些美国汉学家就被运到山东隔离了起来。

1945年战争结束后，很多在山东被拘禁的美国人重新又回到了北平。芮沃寿和芮玛丽夫妇也得以回来。由于芮玛丽和福克司对清史有着共同的研究兴趣，他们建议在1946年成立一个研究清史的学术机构：清史研究会，傅吾康也成为了会员。从1946年1月底至6月间，研究会每隔两个礼拜在一个会员家中召开一次研讨会，由负责的主人准备一个相关的题目。德国人中除了福克司和傅吾康之外，还有海西希、卫德明，此外有：芮玛丽、潘克甫教授，苏联使馆的齐赫文斯基博士，方济各会的Beatus Theunissen博士，被誉为“清史研究第一人”的学者萧一山（1902-1978），版本和文献学家吴丰培（玉年，1909-1996）。

九、汉学研究

在福克司的帮助和启发下，傅吾康搞到了17、18世纪的几份“诰命”，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福克司曾在日本的《史学研究》上发表过“范文程（1597-1666）之诰命”的德文论文，⁴⁶⁾ 他认为这一题目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于是傅吾康查访了北京图书馆的相关文献，特别是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档案资料，发现了很多的这种“诰命”。1941年底，傅吾康撰写了“清代世袭制度中之‘诰命’”一文，后来发表在《华裔学志》上。⁴⁷⁾ 年轻汉学家的每一小步进步，都受到老汉学家的鼓励。福兰阁在读到这篇文章的抽印本之后，在1943年2月21日的回信中写道“有关世袭之‘诰命’

45) Kasakevich, „Sources to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Expeditions into Mongolia“, in: *Monumenta Serica* 8 (1943), S. 328-335.

46) Walter Fuchs, „Fan Wen-ch'eng und sein (1597-1666) Diplom“, in: *Shigaku kenkyū* Vol. 10 (1939), No. 3, S. 14-36.

47) Wolfgang Franke, „Patents for hereditary ranks and honorary titles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in: *Monumenta Serica*, Vol. VII (1942), S. 38-67.

的研究已收到，这是一篇漂亮的有关文化史研究的小文，像其他专门史研究的课题一样，帮助我们认识真实的观念，而遗憾的是，这样的研究在政治档案中几乎总是缺失的。”⁴⁸⁾

另外一篇有关清代的研究是受艾鐸风的启发写成的。艾鐸风曾作为中间人向一位德国医生推荐了清代著名学者阮元(1764-1849)的画像，傅吾康也从中获益，他买到了一份阮元的书法作品以及阮氏所收藏的一把扇子。正是这些阮元的遗物引发了他的“思古之幽情”，并完成了“阮元(1764-1849)”一文。⁴⁹⁾

后来，傅吾康又使用中文文献做了有关晚清时期的外交政策之研究，1943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近百年来有关满清外交政策之中文文献”的英文短文，⁵⁰⁾ 5年以后他又将此文扩展成一篇20页的德文论文。⁵¹⁾

福兰阁的巨著《中华帝国的历史》的书稿只截止到元代，他当时年事已高——1943年时他已有80岁的高龄——不再可能继续写下去了。实际上福兰阁早有这样的打算，希望子承父业，整部著作的明、清两部分由傅吾康来完成。福克司也鼓励傅吾康将研究方向定在明清。傅吾康朝这一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便是在1940年底购买了印刷本的明代历史资料的汇编《明实录》，后来他在中德学会的西文刊物《汉学集刊》上发表了“明各朝实录的纂修及现存抄本考”一文。⁵²⁾

由于受到上文提到的罗文达所翻译的卡扎克维奇的文章的启发，傅吾康将视野扩展到了明代与蒙古的关系，写了“永乐北征蒙古”一文。⁵³⁾ 同样，在这一研究领域，由于受到当时燕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洪业(William Hung, 1893-1980)的指点，他完成了有关曾任兵部右侍郎的于谦(1398-1457)的文章。⁵⁴⁾ 在写作有关于谦的文章的同时，傅吾康也跟胡隼吟、杨宗翰一起于1944年11月探访了北平西裱褙胡同的于谦的祠堂——于忠肃公祠。这里原本是于谦在北京的住宅，英宗复辟后，于谦以“谋逆罪”于天顺元年(1457年)被害。成化二年(1466年)才特招追复原官，将此故宅改为忠节祠。当时此处祠堂已经荒废很久了。

十、学会汉学著作的出版

1940年底和1941年中从德国派来了中德学会三位汉学家的事实表明，学会从事的汉学研究工

48) 出处同上，第118页。

49) Wolfgang Franke, „Juan Yüan (1764-1849)“, in: *Monumenta Serica*, Vol. IX (1944), S. 53-80.

50) Ders., „Chinese Documentary Publications concerning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 in: *The XXth Century*, Shanghai 1943, S. 311-313.

51) Ders., „Chinesische Quelle zur auswärtigen Politik des 19. und frühen 20. Jahrhunderts“, in: *Sinologica* Vol. 1, No. 3, Basel 1948, S. 210-230.

52) Wolfgang Franke, „Zur Kompilation und Überlieferung der Ming-Shih-lu“, in: *Sinologische Arbeiten* 1 (1943), S. 1-46. Chinesische Inhaltsangabe in: *Chung Teh Hsieh Chih* V (1943), S. 373-380. (论文) 明各朝实录的纂修及现存抄本考

53) Wolfgang Franke, „Yunglo's Mongoleifeldzüge“, in: *Sinologische Arbeiten* 3 (1945), S. 1-54.

54) Ders., „Yü Ch'ein, Staatsmann und Kriegsmeister“, in: *Monumenta Serica* XI (1946), S. 87-122.

作不仅仅是被容忍的，而是被希望加以发扬光大的。因此学会也将重印德国汉学家的汉学著作，或出版学会成员的汉学书籍看作是重要任务之一。这之后学会就影印了锡乐巴的德文汉学专著《北京附近之大觉寺》（Heinrich Hildebrand, *Der Tempel Ta-chüeh-sy bei Peking*, Berlin 1897），锡氏系著名的建筑师，曾在德国驻华公使馆任职，后为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为铁路顾问。1898年后他出任胶济铁路总工程师，除了修建青岛至济南450公里长的铁路外，还曾设计过青岛的德华银行和青岛火车站。《大觉寺》一书对寺院的结构和建筑做了详细的描述，书后的碑文德译文大都是由当时在德国公使馆任职的佛尔克提供的。寺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1世纪，在19世纪晚期那里成为了德国天主教圣言会（SVD）神父们在夏季的疗养地。其次学会还出版了贾柏莲的重要古汉语语法专著《汉文经纬》（Georg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Leipzig 1881），此书附有作者的跋以及汉学家柴赫的补注。此外，学会还将福兰阁在非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汉学论文影印出版：《中国文化与历史选刊》（Otto Franke, *Aus Kultur und Geschichte Chinas. Vorträge und Abhandlungen aus den Jahren 1902-1942*）。自1943年起，学会也开始出版自己的汉学刊物《汉学集刊》（*Sinologische Arbeiten*），主要用来刊载学会中的汉学家们的学术论文，一共出了三期。

十一、所交往的其他中国学者

1939年末艾鐸风的老朋友杨宗翰来到北平，他后来担任中德学会的中方会长多年。杨氏出身于蒙古八旗，非常有才干，也具有强烈的传统意识。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具有极高的中文修养，又于1921年赴哈佛大学进修政治学，获得了学位，因此跟其他中国学者比较起来，他更具有国际视野。他的英文相当流利，也有些德文和法文的基础，西方古典文字他都略知一二。他熟知西方文化的脉络和思想的源流，在跟中国人、欧洲人乃至美国人打交道方面，他都很在行。杨宗翰极少自己主动发表什么东西，往往是在别人的要求下才动笔写作。他曾应艾鐸风的请求，写过有关元代书法的文章，显出了他的功底。杨氏曾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做过教授，并曾任北大外文系主任、川大文学院院长等职，后来他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编译委员会任职，直到1940年末该委员会终止。杨宗翰也定居在了北平。

自从福克司当上了中德学会的会长之后，学会的德方成员得到了使馆的许可，他们可以在家中邀请一些与学会有关的中国社会名流。福克司本人是一位理想的东道主，每每使来访者“不知何处是他乡”。以这种方式，傅吾康结识了当时的一批名人。如张燕卿（1898-?），张之洞（1837-1909）之子，此人在30年代曾出任伪满实业部大臣；北平首任市长何其巩（1899-1955），他也创立了私立中国大学；汤芳铭（1885-1975），早年出任过海军中将军的国民党元老，日伪时期曾被迫出任北平治安维持会会长；以及同济大学校友、曾任汪伪国民政府天津市长的周迪平。通过杨宗翰的关系，傅吾康也认识了《清史稿》的编者之一的张尔田（1874-1945），张氏系一位传统的中国文人，时任燕京大学国学总导师。

十二、学会图书馆建设

在中德学会的预算中一直有一部分钱是用来购买在德国出版的最新德文图书的，由于谢理士自己的特殊关系，中德学会基本上都是通过设在慕尼黑的一家书店购置这些图书的。谢理士本人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图书馆馆员，因此他也将学会图书馆中的书管理得井井有条。由于学识方面的缘故，由谢理士在德国订的书其重点在德国文学方面，特别是有关歌德的图书很多，也很全面。

这些图书，也包括后来洪涛生在他的杨树岛印刷厂（Pekinger Pappelinsel-Werkstatt）用影印的方式印刷的一些德国文学典籍（如凯勒[Gottfried Keller, 1819-1890]的《绿衣亨利》等），增加了傅吾康在文学方面的修养，一度他曾沉浸在德国古典文学的世界里。至1943年，学会图书馆共藏有图书4400余册，成为当时中国“藏有德国人生科学书籍最完备之图书馆矣”。⁵⁵⁾

图书馆本来也是由傅吾康来管理，后来由于书籍越来越多，工作量也越来越大，只能聘请请人来管理。1942年经过几次失败的教训后，学会聘请了刘东元来做这项工作，他曾在学会学过多年的德语，基础不错，也结了业。后来他一直做到1945年夏天学会解散，之后在由北图托管时期，他也一直负责这批图书。

十三、在北平的生活

傅吾康来中国之前，以及在1938至1939年间，他父母总共给了他合计1万帝国马克的生活费用。由于他一直在中德学院任职，这些钱他也就省了下来。1940年4月22日他在离北侧城墙很近的宝钞胡同北面的碾儿胡同1号，买了一处房产。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外国人（传教士除外）除了在租界和使馆区以外，严禁以自己的名义拥有地产。因此，傅吾康是找他的同事顾华作为中国代理而购买的。后来他也仿照颇有中国传统艺术修养的艾锷风和福克司家里的陈设，给他的四合院房子配了花梨木的中式家具。这之后，傅吾康真的成了一位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了。

之后由于工资的提高，傅吾康有可能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图书馆。最早的时候，他所收藏的文献基本上是跟清代历史，特别是晚清外交有关的。后来他接受了父亲的建议，由他续修《中华帝国的历史》的明清部分，他也开始集中精力阅读、收集有关明史的文献。他在当时听从了福克司的提议，即按照当时北平地方的习惯，在某一个礼拜的固定日子和时间，傅吾康在家中专门接待不同的书贩。他告诉这些书贩们他的兴趣所在，他们则向他推荐相关的书籍。这样他便可以在汗牛充栋的书的海洋中找到一些跟他的研究相关的文献了。当时购书的具体程序是这样的：傅吾康首先将他感兴趣的书留下，之后再慢慢瞧，从文献学的角度仔细研究一番。如果他真想买某一本书的话，那么在书贩第二次来访的时候，他会询问价格。通常的情况下，书贩在头一次会给出

55) 胡隽吟：“中德学会与中德文化”，载胡隽吟译编《德国学术论文选译》，香港：和记印刷有限公司，1981，第23-34页。此处引文据第31页。



傅吾康在北平时的书房

个很高的价格。傅吾康会跟他讨价还价。买成一本书常常需要书贩来访好几次，双方都作了让步之后，他们最终达成共识。正是通过这一方式，傅吾康买到了很多种非常难得的明刻本古籍，这些珍本、善本著作，以及许多研究性文献和相应的笔记，也成为了他后来有关明史研究的资料来源。同时他也乐于听取有经验的中国文献学家如吴丰培（当时也是中德学会的会员）以及藏书家谢国桢（1901-1982）或版本学家赵万里（1905-1980）等人的意见或建议。

当时在北平岂止是书籍，艺术品以及稀奇之物的市场也有很多，艾锷风和福克司可以说是这些方面的行家了。而傅吾康对此兴趣不是很大，除了为他的住房买了些古典花梨木家具之外，还买了些价钱比较便宜的明清字画和瓷器。

1939年由胡隽吟的父亲胡万吉（稚卿）留德时的同学杨丙辰介绍，胡女士开始为《研究与进步》译稿，并负责一些编辑工作。不久，傅吾康就跟胡隽吟相爱了。自1941年起中德学会正式聘用胡隽吟为常务编辑。此时傅吾康跟胡女士的关系已经很明确了，不过按照当时帝国的法律，日耳曼人是不可以娶非雅利安人为妻的，否则的话傅吾康就得被迫辞去中德学会的职务。傅吾康自己也承认：“由于跟隽吟的友谊，中国文化及中国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讲就更亲近了！”⁵⁶⁾直到1944年9月他们才正式订婚，1945年3月在战争结束之前，终于结为百年之好。从此傅吾康跟中国的关系，从朋友变为了亲戚，就更亲密了。

傅吾康后来解释为，一种精神的活力系附着他们俩。在后来的近五十年的婚姻生活中，傅吾康一直感到非常幸运！⁵⁷⁾

1945年8月之后，中德学会关门，傅吾康和胡隽吟夫妇都没了工作，不过依靠多年的积蓄，短时期内的生活还不成问题。秋季之后，北平的局势基本稳定，他们考虑要一个孩子。1946年

56) 出处同注1，第106页。

57) 出处同上，第126页。

7月16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北平出生了，是个女儿。不久便传来了福兰阁在家乡去世的噩耗。因此他们给女儿取名Renata，中文名：复生，希望老父亲乘愿再来的意思。

战后美国的公众意见也希望中国和平发展，马歇尔以杜鲁门总统特使的身份来中国进行调停，想使国共双方捐弃前嫌，化干戈为玉帛。傅吾康也一度想弃学从政，真正为中国的前途做些事。1946年4月马歇尔调处在北平设立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招干事，傅氏欣然前去应聘。但最终很可能是因为他是德国人而没能成功。看来他做学者的命运并非轻易可以改变的。

十四、身份认同——大抵心安即是家

在中国生活了三年多之后，特别是有了中国女朋友之后，傅吾康的身份认同也发生了变化。1941年1月27日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从某些方面来讲，我现在已经被“汉化”了。一方面，这是这么多年我一直从事跟中国有关的工作使然，另一方面，我的本性跟这里的一切，也非常默契。因此，自从我踏上了这块土地的第一天起，我就有了回到家的感觉！⁵⁸⁾

而在六年以后的1943年8月12日，傅吾康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我在这里的环境跟大部分其他的欧洲人士相比，与中国的世界更为接近，更为密切。跟在北平的汉学家们相比，也是如此。毋庸讳言，我自己也以最强烈的方式感受着这一文化的影响。从而也具有了从另外一个视角审视欧洲的能力。现在能如此透彻地认识这许多事物，以至于我已经不可能重新回到原先那充满成见和片面性的生活中去了。如果我们生活在五万年前的话，那肯定会比现在容易得多！另一方面，我也不愿意成为一个亚洲人，越是与我周围的环境亲近，我就会越加清晰地认识这里的一切。我自己亦愈加清楚地知道，我与他们之间的差别。我不愿像其他人一样陷入到这两个世界之中去，而完全没有了自已的立场。但我却清楚地意识到，我的立场在哪里，这一点我真的要感谢你们，这是你们在有意和无意之间教给我的，从做各类小事开始，一直到责任感、独立思考的培养，这些都为我在思想方面深入探究周围的环境，并为我的行为打下了一个人类学的基石。⁵⁹⁾

尽管傅吾康热爱中国，熟悉中国，但他那欧洲人文、人类学的视角却从未改变过，对他来讲，有意思的是既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又不至于丧失自我的立场。

58) 出处同上，第109页。

59) 出处同上，第129页。

十五、圣言会在西山的疗养院

从1941年起，傅吾康再去西山游览的时候有了新的落脚点：圣言会（SVD-Steyle Missionare）——辅仁大学从1933年起就是由此休会接替本笃会（OSB-Order of St. Benedict）继续兴办的——早在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前就在北安河附近，也就是离大觉寺仅几步之遥的地方购置了一座小寺院——建于明天顺五年（1461）的普照寺。这里特别是为那些在中国长年传教的休会神父们提供疗养的场所。因为这些神父常常一辈子都生活在中国，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回他们在欧洲的老家。后来“普照禅林”更名为“普照院”，被改造为大约10个客房，并且有一个冷泉水的游泳池，这是以前寺院所留下来的。当时的普照院由圣言会的满恩礼神父负责。⁶⁰ 满神父多年来一直在山东传教，那时他已经年近花甲，满脸的络腮胡子也已经全白了，给人一种敬畏而又和蔼的感觉。满神父为人谦虚，友好，善良。因为北平当时是在日本军队的实际控制之下，而这一代又是游击队——八路军经常出没的地方，因此对满神父来讲，要灵活地同各方打交道，以避免陷入与某一方的冲突之中。这里是圣言会的地产，满神父同周围的邻居相处得也甚是融洽，从来没有与谁产生过纠纷。由于华北战事愈演愈烈，从其他省区来普照院疗养的神父也愈来愈少，满神父得到了上级的许可，也接受其他客人在此处短期或长期的住宿要求。

1940年8月傅吾康第一次由八大处出发，经三家店、寨口，到普照院，就是在那里过的夜。之后再从山中回北平。每年农历的四月初一和十五，傅吾康都会去妙峰山逛庙会。1941年他第一次在这个季节乘车从北平经北安河，去了普照院。从那里又走了3-4小时，便爬上了妙峰山，傍晚的时候从山上下来，在满神父那里住了下来。第二次是在六月间，他乘车去碧云寺，并从那里徒步漫游至普照院。同年9月他还第一次骑车，经由黑龙潭、温泉，大约用了2-3个小时之后，也看了所有的地方。之后，日本人在温泉设了岗哨，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其他外国人随时存在着被扣留或被遣送的危险。因此他后来再去温泉的时候，就改走了超北走向的、迂回曲折的田间小道，有时他也跟福克司或其他朋友一起去那里。即使有时不愿登上妙峰山的话，在周围散步也让人有赏心悦目的感觉。

西山的秀丽景色在早年也给福兰阁留下过深刻的印象，那是1889年的夏天，当时在公使馆作翻译生的福兰阁第一次到风景宜人的西山大觉寺避暑，他在晚年的时候回忆道：

我们那时在高耸陡峭的山脚下的大觉寺中租了几间房，并布置了起来。尽管这些两千米上下的山峰上的树木不多，但雨季之后所形成的汹涌澎湃的溪流，流入深深的谷底和沟壑之中，构成了美丽的景色。从山顶远眺，广袤的山地尽收眼底。这一山脉围绕着华北平原，向北往下延伸，一直过渡到蒙古高原。……只要时间允许的话，我就会从大觉寺进入山中，不

60) 有关满恩礼神父的生平，见Leopold Leeb（雷立柏）编《在华SVD传教士列传（1879-1955年）》（ad usum internum tantum），第89页。

过在寺院中观看和尚们做佛事、唱佛赞，也让我获益匪浅。⁶¹⁾

跟父亲一样，傅吾康对西山独有情钟，那里一直是他郊游和修身的好去处。直到晚年傅吾康在回忆到北平的生活时，依然忘不掉山明水秀的西山、淡雅的普照寺、风格质朴的大觉寺……。后来他每次到北京，只要时间允许，都会到那里小憩。

十六、超越政治的羁绊

傅吾康写道：“一个由德方资助的学院当然是不可能与德国的政治导向为敌的，必须要做一些妥协，比如悬挂希特勒的像等等。”⁶²⁾他同时指出，实际上德国使馆并不关心学会内部的具体事务。⁶³⁾尽管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

原则上讲，学会与使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亦即政治宣传不应当是中德学会的任务。相关的合作只能与中国人而非日本当局进行。日本的一些激进的德国纳粹党员曾强烈批评中德学会在与日本合作方面的缺陷。⁶⁴⁾

尽管傅吾康曾向北平的纳粹党部提出过申请加入纳粹的请求，但因为当时欧洲战事已起，他的请求必须通过德国的党部批准，后来此事便不了了之。1944年9月22日他跟胡隽吟正式订婚之后，当时在北平地区的党部书记——德华银行（Deutsch-Asiatische Bank）的白迟客得知这件事之后，向傅吾康友好地解释道，与中国人结婚是违反党的原则的。傅吾康也顺便要求撤回了自己的申请书。

从本质上讲，跟父亲福兰阁相比，傅吾康并不把政治看作生命的重要部分。当时傅吾康在日本侵占统治的政局下，在北平所从事的研究基本上是不涉及日本、德国和中国三方面的政治和军事的。⁶⁵⁾在论及他这一代与乃父之间的差别以及自己的秉性时，傅氏写道：

61) Otto Franke, *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 Randglossen zur eigenen Lebensgeschicht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Co. 1954. S. 53.

62) 出处同注1，第66页。

63) 出处同上，第111页。

64) 出处同上，第111页。

65) 詹森 (Thomas Jansen) 对傅吾康所认为的中德学会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机构提出质疑，他认为：“作为一个接受纳粹政府经济资助的组织，尤其是在1940年正式成为德意志学院的分支机构后，它起到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宣传的作用。不过，由于该学会远离纳粹政治中心，相比当时德国国内的文化机构而言，拥有更多的自主决定的空间，在一些情况下，德国和中国的学者也因此受益。”詹森“北京中德学会在1933年至1945年间所从事工作的几点说明与质疑”，载马汉茂等主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76-193页，此处引文见190页。

我父亲乃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外交官，在他的人生中政治至关重要。即使在家中他也总是衣冠楚楚，从不马虎，他的举止考究、自信，富有尊严，从不狂妄。对其自身也不会听之任之。在很大程度上他算得上是19世纪晚期绅士之典范。跟我父亲正相反，对我来说，政治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更向往无拘无束，在衣着方面常常不修边幅，举止亦笨拙不堪。我甚至很少考虑什么是体面，而更愿意顺其自然。⁶⁶⁾

当时中德学会图书馆也有一些被纳粹明令禁止的书籍，对此，这些书也只是被放在特别的地方而已。在学会1940年底印制的德文图书目录中，这批书被印在附页上。在邮寄这些图书目录的时候，学会根据不同的收件人而决定是否将附页也一并寄去。晚年的傅吾康依然记得一件惊心动魄往事：1943年德国公使考德——当时是南京德国使馆的二号人物，并且德国政府已于1941年7月承认了汪伪南京政府——来北平访问时，也到了中德学会参观。在查看图书馆的中文图书时，考德随手抽出了一本本来不应当放在那里的译本，那是在德国早已被禁止的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的中译本。公使很平静地将书放回了原处，没有说什么。傅吾康当然很是担心，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后来什么也没发生，傅吾康所不知道的是，考德此时已是反纳粹运动的成员。1950年他们在德国再次见面时，考德又提到这次在北平的小小插曲，并告诉了傅氏其中的内幕。

十七、短暂的日本之行

在战争期间，由于德国和日本的特殊关系，傅吾康有机会到日本去跟日本汉学家进行交流。1943年9月他去了日本，主要想收集与《明实录》相关的善本或与《明史》有关的原始文献之手稿。他在东京参观了著名的“东洋文库”（Tōyō Bunko），并被允许使用那里的图书馆。当时在那里有关汉学方面的资料之丰富，是中国任何一家图书馆所望尘莫及的。遗憾的是，他每天中午必须中断阅读，以便准时回酒店用午餐。由于中午耽误了时间，他晚上不得不忍着饿，很晚才回去。通过福兰阁的关系，傅吾康也结识了后来出任“东洋文库”总经理的榎一雄（Enoki Kazuo），他当时已经是一位颇受人尊重的年轻学者了，主要在一家学院教书。他推荐傅吾康去了几家著名的私人藏书楼，包括静嘉堂文库（Seikadō）、尊经阁（Sonkeikaku）以及上野（Ueno）藏书楼。傅吾康在这些图书馆中找到了很多对他的研究来讲非常重要且珍贵的书籍和手稿。后来傅吾康一生亦未中断与榎一雄的联系。

经汉堡时期的老同学、当时任德意志文化学院（Das deutsche Kulturinstitut）院长的查赫特介绍，傅吾康也参观了当时并不对外开放的宫廷图书馆内阁文库（Naikaku）和图书寮（Toshoryō）。他也在东京千代（Kanda）的书店买了很多极有价值的汉学书籍，这些书籍后来

66) 出处同注1，第1页。

是通过在日本的德国使馆的外交邮件寄回到北平的。

在京都，傅吾康访问了那里的著名汉学研究所：东洋文化研究所（Tōyō Bunka kenkyūjo）及其所属的图书馆。在京都大学，傅吾康拜会了校长大人，并与著名汉学家羽田亨（Haneda Tōru）进行了长谈。在汇文堂（Ibundō）书店，他也购买了很多的图书。

这是傅吾康在中国停留13年间唯一一次离开中国，40天后他又回到了日夜等待着他归来的胡隽吟的身边。同时，这次的日本之行可谓是硕果累累，傅吾康在1944年和1945年所发表的有关《明实录》的论文续篇：“再论明实录编纂及流传”⁶⁷⁾以及“明实录编纂及流传补遗”⁶⁸⁾，就是日本访书的成果。

十八、杏坛春暖及成都两年

由于中德学会隶属于在慕尼黑的德意志学院（Deutsche Akademie），而这一机构就是后来歌德学院的前身，因此推广德语也是其重要的任务之一。傅吾康所组织的德语夜校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40/41年冬季学期共有学员184人，而夏季学期则有111人参加了语言班。傅吾康当时担任二年级的语言课，在他的班中就有当时在辅仁读书的王光美，她后来成为了刘少奇的夫人。⁶⁹⁾

从1945年春天起，傅吾康受聘于辅仁大学。一开始他在那里给四位对汉学感兴趣的圣言会神父开了一个有关汉学的研讨班，他们分别是穆天民、卜恩礼、石眉鸣以及山尚德，后来他们也都在汉学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从此年的秋季学期开始，他又为一些历史系的硕士生开设了有关明史的研讨班，1946年他还同这些学生一道骑自行车去了位于玉泉山北麓的代宗朱祁钰的陵园，著名的景泰陵。

傅吾康的岳父大人胡万吉在一战期间曾留学德国柏林的农业高等学校，也曾在柏林大学的东方语言学院教过汉语。回国以后，曾任文职。鉴于他跟当时任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萧公权（1897-1981）的关系非同一般，他通过这一渠道为傅吾康谋得了这两所大学的位子。当时大学给他提供的是一个副教授的职位，在征求了他在北平的朋友们的意见之后，傅吾康写信要求一个正教授的位子，不久他便获得了这个职位。1946年9月19日傅吾康乘飞机飞抵重庆，在大学里他又见到了早年在汉堡时的中文教师商承祖，当时他在大学里任德国语言文学的教授。之后傅吾康辗转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成都。

在成都，经萧公权的介绍，傅吾康认识了在这两所大学任中文系教授的闻宥（1901-1985），

67) Wolfgang Franke, „Weitere Beiträge zur Kompilation und Überlieferung der Ming Shih-lu“, in: *Sinologische Arbeiten* 2 (1944), S. 1-29.

68) Wolfgang Franke, „Nachtrag zur Kompilation und Überlieferung der Ming Shih-lu“, in: *Sinologische Arbeiten* 3 (1945), S. 165-168.

69) 出处同注1，第116页。

他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研究所（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Research Institute）的所长。傅吾康很快便跟闻宥成为了朋友，并且也在研究所任职。闻宥本人非常重视西方和日本汉学家所取得的成就，这也是在他的研究所为什么收藏有欧洲汉学专业杂志——整部《通报》的缘故。研究所由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 Yenching-Institute）资助，并且出版西文的刊物《汉学研究》（*Studia Serica*, SS）。该研究所也同其他逃亡到成都的教会大学共同出版以中文为主的期刊《中国文化汇刊》（*Chung-guo wen-hua hui-k'an,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BCS）。傅吾康主要是协助编辑部的工作，并且为这两份刊物撰写文章，这当然也是他的兴趣所在。当时在研究所的也有后来非常有名的学者，如从事古典诗歌研究的缪钺（1904-1995），他是哈佛毕业的历史学家杨联陞（1914-1990）的内兄，人很好，也比较容易接近。

傅吾康同时也用英文为两所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开设汉学文献选读课程，因为中文系学生的英文知识非常有限，并且大部分学生由于受到过中文的传统教育，所以对于现代学术思维和论证的一套完全不能领会。闻宥和傅吾康都希望通过汉学方面的培养，让这些学生克服单一训练的方式。在学生听不懂的情况下，傅吾康尽量用中文来解释，但这样的努力收效并不大。尽管如此，对学生来说，也多了一个理解中国学术的崭新维度。

在川大傅吾康被安排在史地系，系主任一度是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教授（1898-1991），他被公认为是中国古代史方面的专家。在系里任教的有曾在哈佛博士毕业的时任省博物馆馆长的冯汉骥，省图书馆馆长蒙文通等名流。傅吾康当时教授的课程是“中西交通史”，从地域上来讲，所谓的“西”是汉族中国以西的所有地区，从时间上来讲，一直持续到前现代。当时由于西文资料缺乏，准备起来颇费了些功夫。此外他还讲授“德国历史”课程，他所依据的是魏以新翻译的《德国史纲》，⁷⁰⁾此书1935年作为“中德文化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在成都还能买到。当然，他还增加了一些其他的材料，包括他在上学时老师所讲的德国史的内容。第二年他开始讲授明史，此时他接受了妻子胡隽吟的建议，不再用英文而改用中文授课。

在成都期间，傅吾康也经常到城中拜访由比利时本笃会神父创立的“中西文化研究所”，尽管他们之间的信仰不同，但相互之间却能很好地相互理解。

旧书店自然不能逃过傅吾康的视线，他在成都也淘到了一些在北平买不到的书籍。比如1934年由申报馆出版的丁文江（1887-1936）等编的《中华民国新地图》，⁷¹⁾这是当时最好的地图册了，他也是在成都以合适的价格买到的。

在成都，傅吾康还认识了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激烈的反孔文人吴虞（1872-1949），当时吴氏已经是70多岁的老者，威风依然不减当年，只是在保守的四川老家他不那么受人爱戴而已。

最令人高兴的事情莫过于“他乡遇故知”了，傅吾康在成都又见到了他在柏林求学时的老师雷兴教授。雷兴教授自1935年起任加州大学伯克利（Berkeley）分校的东方语言学教授，并于

70) Johannes Haller, *Die Epoche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Cotta, Stuttgart, 1928.

71) 该地图集英文名为：*New Atlas of China*，系中国最早的现代地图集。是为了纪念《申报》创刊60周年，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编制，1934年由上海申报馆出版的。

1946年入了美国籍。他在1947年2月至7月间在成都作为期几个月的学术研究。他对福兰阁的帮助一直感激涕零，因为当时他之所以能在柏林当上教授完全仰仗福兰阁的举荐，那个位子原本是提供给福兰阁的，而他却让给了雷兴。在学术方面，雷兴教授给予了傅吾康诸多的启发。他也与傅吾康一家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关系，当Renata施洗的时候，雷兴便作为她的教父。

在学术研究方面，傅吾康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在成都的一段时间里，使他见到了以往在北平所未曾见到的后方的一些汉学研究成就。1947年他在《中国文化汇刊》上发表了英文的文章“战争期间（1937-1945）中国后方的汉学研究”的论文。⁷²⁾徐中舒教授提醒傅吾康注意有关1457年于谦遭诬陷以谋逆罪被杀一案的一份新文件。此前，有关此案傅吾康曾做过较为详尽的研究，写过一篇文章。根据这一新发现的文件，他又为《汉学研究》写了一篇德文的文章：“1457年审讯于谦的一个文件”⁷³⁾。同一期的杂志还刊载有福克司和宾格尔的文章，后者也是用德文发表的。作为杂志系列的第一本英文专著，出版了罗文达翻译的璞科第有关明代与蒙古关系的专著。⁷⁴⁾《汉学研究》以及英文系列的专著，不仅仅在中国，甚至在国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艾伯华就曾对此刊物评论道：“最后我不得不提到，在中国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中国的西南大学在眼下世界被撕裂的状况下，捍卫了真正学术合作的理想，在他们的刊物中，发表了各种语言的论文，这不能不令我对此惊叹不已……。”⁷⁵⁾

最让傅吾康感到自豪的是，他在北平多年来编纂的英文提要《明代史籍汇考》一书于1948年作为杂志丛书之一种出版。⁷⁶⁾这本118页的小册子后来也奠定了傅吾康在明史方面研究的国际地位。

成都也为傅吾康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闻宥教授向他介绍了那里特有的汉代墓葬文化。1948年春天，傅吾康利用研究所给他提供的机会，在乐山待了五个礼拜的时间，实地考察了嘉定府所遗留下来的无数的汉代岩墓。随他同去的还有两位工匠，他们拓下了50多种浮雕纹饰图案，南京金陵大学的杨枝高博士则向他指明了墓葬的确切位置。这次考察，对傅吾康来讲可谓是硕果累累，不久他便完成了两篇有关汉代墓葬的论文。⁷⁷⁾在四川所作的金石学之田野考察，也为60年代以来他在东南亚大规模采集华文金石铭刻文献打下了基础。

72) Wolfgang Franke, „Sinological Research Work in Free China during the War Period 1937-1945“, in: *Chung-guo wen-hua hui-k'an,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Chengtu-Nanking), 6 (1946/47), S. 137-171. 此文中文译文见：《国际汉学》第15辑（2007年4月）第105-131页。

73) Ders. „Ein Dokument zum Prozeß gegen Yü Ch'ien i. J. 1457“, in: SS VI (1947), S. 193-208.

74) Pokotilov, *History of the Eastern Mongol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from 1368 to 1634*, Studia Serica, Monogr. Ser. A, No. 1, Chengtu 1947.

75) 出处同注1，第160页。

76) Wolfgang Frank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Studia Serica, Monogr. Ser. A, No. 2, Chengtu 1948, 118 S.

77) Ders., „Die Han-Zeitlichen Felsengräber bei Chia-ting (West-Ssuehuan)“, in: SS VII (1948), S. 19-39; Ders., „Gräber aus dem 2. Jahrhundert n. Chr. in Ssu-ch'uan“, in: *Sinologica* 2/4 (1950), S. 294-298.

在成都的两年时间里，傅吾康也与来自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法国汉学家于儒伯交上了朋友，于氏曾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于1947年被保送至北平的法国汉学研究中心当研究生。他们一道去了西藏的东部地区，这次为期一个月的旅行也是傅吾康一生中唯一一次在西藏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在《中国和东南亚游记（1937-1990）》中，⁷⁸⁾对此多有描述。

不久，傅吾康就收到了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冯至的邀请，希望他能到北大任德国语言文学的教授。这是因为卫德明接受了华盛顿大学中国历史的讲师职位，从而在北大出现了空缺。1948年9月傅吾康重又回到了阔别两年的北平。

十九、重回北平及告别中国

回到了疏阔两年之后的北平，傅吾康开始寻找他以前的德国汉学家朋友们，宾格尔、福克司、霍福民以及海西希都被遣送回去了。艾锷风跟他的中国妻子曾幼荷（1923-）⁷⁹⁾去了厦门，之后在火奴鲁鲁的博物馆找到了中国艺术馆的职事一职，1950年以后他曾出任夏威夷大学东方美术学教授。马丁因其母亲是美国人，卫德明和他的犹太裔妻子，罗文达都去了美国，并在那边待了下去。卫德明自1953年起在华盛顿大学作了教授，一直到1971年退休。罗文达后来在康奈尔大学和佐治顿大学做了助教和讲师，之后离开学术界进入工业界。与傅吾康关系比较密切的人中，只有罗越单身一人还留在北平，他当时在清华大学做德语专业的副教授，住在工字厅外籍教师宿舍。此时的傅吾康惟有感慨“良友远离别，各在天一方”了。

傅吾康的大部分中国朋友还留在北平，只不过洪业和方志滂已经去了哈佛，顾华也离开了。不过中德学会还完好无损，由国立北京图书馆代管，在那里具体负责的是刘东元。在老朋友当中，他经常能见到的是冯至，冯教授以前曾任中德学会中方会长，傅吾康此次之所以能从成都回到北平，也是他促成的。现在他成了傅氏的直接上属。后任会长的杨宗翰以及任秘书的张天麟也常常能见到。张氏曾是德国的日耳曼学和教育学双料博士，当时任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

在燕大，傅吾康经常看望的是历史学家齐思和（1907-1980）、翁独健（1906-1986）以及从哈佛来的中国佛教学者陈观胜（Kenneth Chen, 1907-）。在清华大学他除了时不时地探望罗越之外，他也常去拜访陈寅恪。在国立北京图书馆，他同袁同礼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在北大，傅吾康除了在西语系教歌德的《浮士德》和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外，他也在郑天挺（1899-1981）任系主任的历史系开设了明代中蒙关系的研讨班。由于当时政局动荡，个人的前途未卜，这一阶段傅吾康在汉学研究方面的进展不大。不过，他还在为璞科第的《明代（1368-1634）东蒙古史》做“引得与更正”，后来被列入了《汉学研究》研究专著系列而在北平

78) Ders., *Reisen in Ost- und Südostasien 1937-1990*, hrsg. von Hartmut Walravens, Biblio Verlag, Osnabrück 1998.

79) 曾幼荷系1939级辅仁美术专修科毕业，之后留辅仁大学任助教。

得以出版。⁸⁰⁾此书在语言方面，也得到了年轻的美国汉学家帕森斯的润色。

由于《汉学研究》是用西文印刷出版的，在北平印制显然要比在成都具有很多优势。因此闻宥建议由傅吾康负责此书在北平的印刷工作。第8卷（1949）和第9卷（1950）就是由傅吾康主编的，并且刊载了他的两篇论文。其后，鉴于当时的时局，杂志的继续出版已经不再可能。

当时有很多的西方汉学家依然住在北平。法国人在北平于战争中建成的“中法汉学研究中心”（Centre Franco-Chinois d'Etudes Sinologiques）也成为了法国汉学家到中国来的据点。当时任主任的是韩百诗，中心还有语言学家李嘉乐，出生于维也纳的道教专家康德谟以及曾跟傅吾康游历过西藏的于儒伯。法国汉学圈子里也有修会的汉学家，如吴德明，他是耶稣会的汉学家，后来在汉赋研究方面，独树一帜。

美国汉学家中，有傅吾康在柏林时的同学金守拙，他当时已经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了。此外，曾因翻译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而名噪一时的卜德也在北平，后来他转向中国近代史研究，对美国中国学打破传统汉学狭隘的学科界限，摆脱欧洲传统汉学之影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北大，傅吾康的德国同事是傅汉斯，他是一位移民至美国加州的德国古典语文学家的后代，曾在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接受了教育。当时傅汉斯在北大教授拉丁语、德语和西方文学。傅汉斯后来认识了在北京大学担任昆曲和书法教师的昆曲表演艺术家张充和（1914-），之后与其结婚。张充和是著名作家沈从文（1902-1988）的小姨子，张家祖籍为安徽合肥，其曾祖张树声（1824-1884）官至两广总督，曾有“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的著名主张。

傅吾康的家也成为了很多汉学家落脚的地方。他在家中接待了雷兴在加州的弟子鲁道夫以及他的老师西门华德。西门教授还算比较及时地离开了纳粹德国，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院长一职。他在中文和藏文语言学方面的贡献，是其他汉学家很难达到的。

由于其研究范围在明清，傅吾康一直跟清史专家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回北平之后，他还专门拜访了当时作为外交官的清史专家齐赫文斯基，后来此人对苏联的东亚政策制定起到过非常关键的作用。

当时西方汉学家们的聚会改在了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中进行，其组织者是该委员会的主任、英国著名汉学家费子智。在那里聚集了各国的汉学家，也经常举办各种各样的学术报告，如卜德的“托尔斯泰与中国”，山口（Yamaguchi）的“日本汉学”，⁸¹⁾李维义的“西藏活佛”，李华德有关佛教的题目，傅吾康也在这里做了有关川西汉墓的报告。

还有一些国外的汉学家也是傅吾康在当时的北平常常能遇到的，这包括瑞典人毕汉斯以及日本人今西春秋（Imanishi Shunjū），后者给了傅吾康很大的帮助，特别是他有关《起居录》的论著，给傅氏的《明实录》研究以极大的启发。

1950年1月11日，傅吾康与胡隽吟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这是一个儿子。傅吾康以他死去

80) Ders., *Addenda and Corrigenda to Pokotilov's „History of the Eastern Mongol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from 1368 to 1634“*, Studia Serica, Monogr. Ser. A, No. 3, Chengtu-Peiping 1949, 95 S.

81) 此人可能为：山口察常。

的伯父命名之，Peter，中文名则叫做：傅新生。

在中国的学者中，跟傅吾康关系比较密切的有曾在格廷根从瓦德施米特读过博士的季羨林，当时季氏是印度学教授，也是东语系的主任。两人从此结下了一生的友谊。1950年8月傅吾康回到德国之后，在从汉堡去玛堡（Marburg）参加德国东方学家大会的归途中，专门在格廷根停留了几个小时，将季羨林1945年仓促离开德国时未来得及带走的书籍，托运回了中国。⁸²⁾ 历史学家、北大图书馆馆长向达先生（1900-1966），日耳曼学者田德望（1909-2000）也常常与傅吾康见面。当时他还有幸在清华园吴晗（1909-1969）的家中拜会了这位明史专家，那时吴晗刚刚完成《朱元璋传》的写作。令傅吾康惊叹不已的是吴晗家中的卡片系统，他将《明史》中众多的一手文献里相应的引文，都逐条用卡片的形式分类给出，做的时候颇费功夫，而使用的时候却非常方便。

1949年初，罗越就又回到了慕尼黑民族学博物馆东亚部任职，同时也跟他的家人团聚。其他的德国朋友也都在考虑回国的事宜。早在1948年秋季，傅吾康就申请了香港大学汉学系教授的职位，这是原先在成都时认识的此时已经在港大做教授的病理学家侯宝璋先生专告他的。不过，战后在英国殖民地的大学中，是不可能由一个德国人出任汉学系教授的，此事最终当然是没能成功。

战后的德国汉学界也是百废待兴的局面，汉堡大学自然也不例外，由于颜复礼本人在第三帝国期间加入过纳粹，成为了党的积极分子，战争结束后他被迫退出教授的位子。这一位子当时从学术方面的考虑，福克司是再合适不过了的，只不过他也曾一度加入过纳粹党，因此并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由于雷兴从美国伯克利写给汉堡大学的一份既正面又客观的推荐信，傅吾康成了这一教授的人选。问题是尽管傅氏拥有民国政府教育部1946年核发的正教授资格的证书，但这在德国并不被认可。海尼士反对对傅吾康的任命，理由是傅氏并没有按要求在德国做过教授资格论文（Habilitation）。（哈斯在德国重新获得了教授席位之后，也希望他的朋友卫德明能重返德国作教授——其间卫氏已在西雅图获得了教授的位子——他的努力也成了徒劳。）值得庆幸的是，1949年6月傅吾康在北平等到了汉堡早在3月就正式发出的任命书，他得到了汉堡大学汉学系教授的职位。

1950年5月傅吾康离开了他生活、工作过的中国。来北平时只是孤寂一身的傅吾康，此时携妻带子（此时已有一女一子）回到了阔别十三载的汉堡。

二十、尾声

傅吾康在中国的这些年，除了作研究、写作、编杂志之外，就是教书，可谓杏坛春暖，桃李盈门。他是位有独立见解的学者，其学术研究的动机和出发点，是基于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热爱。

82) Wolfgang Franke, *Im Banne Chinas: Autobiographie eines Sinologen 1950-1998*. Dortmund: Projekt-Verl., 1999, S. 4.

爱。

马汉茂在傅吾康晚年的回忆录《为中国着迷》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傅吾康以其对汉语出神入化的掌握程度，长年来获得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和文化的坚实基础，每每令吾辈折服。因为这些能力对我们战后一代的汉学家来讲是望尘莫及的。他同样令人信服的具有多年来在北平所铸就的一位历史学家的国际视野，正是这样的国际视野决定了他的《中国手册》(*China Handbuch*)的编撰方案。⁸³⁾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国际视野，傅吾康才得以继承并发展了乃父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成就。与福兰阁关于19世纪以前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东亚文化圈内发展的中国的研究相比，傅吾康关于明清以及近代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通过种种决裂和危机走向现代化过程的探索，正是这样的一个世界性眼光的体现。因为明清以降的中国历史，再也离不开世界了。而这样的一个国际视野，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段在中国十三年之久的宝贵人生经历和切深体验所铸就的，这一点无疑是许多一直在德国从事研究工作的汉学家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图片由Wolfgang Franke的女儿Renata Franke提供，特比说明。)

附录一、1937-1950年傅吾康汉学论著目录

缩略语及刊物说明：

- A Aufsatz 论文
- B Besprechung 书评
- H Herausgabe 主编
- M Monographie 专著
- V Vortrag 演讲稿
- Z Zeitungsartikel 报纸文章

MS *Monumenta Serica*, Peking

OLZ *Orientalische Literaturzeitung*, Leipzig

OR *Ostasiatische Rundschau*, Hamburg

83) Helmut Martin, „Der Graben und die Einebnungsbestrebungen“, in: Wolfgang Franke, *Im Banne Chinas: Autobiographie eines Sinologen 1912-1950*. 2., bearb. Aufl. -Dortmund: Projekt-Verl., 1997 (Edition Cathay; Bd. 11). S. iii.

SS *Studia Serica*, Chengtu

1937

1. B. J. Jaspersen, *Do Mau. Arbeit und Abenteuer eines deutschen Chinakaufmanns*, OLZ 1937, Nr. 5, Sp. 331-332.
(书评) 一个德国的中国贸易商之工作与历险 (J. Jaspersen 著)
2. B. Grover Clark, *China am Ende? Fünf Jahrtausende chinesische Kultur, Gesellschaft, Religion, Politik und Wirtschaft*, OLZ 1937, Nr. 10, Sp. 647-651.
(书评) 中国是否穷途末路? 五千年中国之文化、社会、宗教、政治与经济 (Grover Clark 著)
3. Z. „China im Aufbau“, *Kölnische Zeitung* 16. 7. 1937 (Morgen-Ausg.).
(报纸文章) 建设中的中国
4. Z. „Die Lage in Nordchina. Wie der Konflikt entstand“, *Kölnische Zeitung* 4. 8. 1937 (Morgen-Ausg.).
(报纸文章) 华北的局势。冲突之所以形成
5. Z. „China und der Rätebund“, *Kölnische Zeitung* 5. 10. 1937 (Morgen-Ausg.).
(报纸文章) 中国与解放区
6. Z. „Nordchina nach der Eroberung“, *Kölnische Zeitung* 23. 11. 1937 (Morgen-Ausg.).
(报纸文章) 被征服后的华北
7. Z. „Der chinesische Seezoll“, *Kölnische Zeitung* 29. 12. 1937 (Morgen-Ausg.).
(报纸文章) 中国海关

1938

8. A. „Bericht über Ausgrabungen in China seit 1930“, *MS III* (1938), S. 659-666.
(论文) 自1930年以来的有关中国出土文物的报告
9. A. „Veränderungen im chinesischen Universitätswesen als Folge des japanisch-chinesischen Konfliktes“, *Geist der Zeit. Wesen und Gestalt der Völker* (Organ des DAAD), 16. Jahrg., Januar 1938, S. 57-58.
(论文) 由于日中冲突而引发的中国大学性质之改变
10. B. Werner Eichhorn, *Chou Tun-I. Ein chinesisches Gelehrtenleben aus dem 11. Jahrhundert*, OLZ 1938, Nr. 2, Sp. 126-128.
(书评) 周敦颐——11世纪一位中国学者之生平 (Werner Eichhorn 著)
11. B. P. Bertram Schuler, *Altes Erbe des neuen China. Ein Beitrag zur Verständigung von West und Ost*, OLZ 1938, Nr. 11, Sp. 707-709.
(书评) 新中国的古老遗产。论西东之沟通 (P. Bertram Schuler 著)

1939

12. B Charles S. Gardner,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II (1939/40), S. 141-143.
(书评) 中国传统之史学 (Charles S. Gardner 著)
13. H *Yen-chiu yü chin-pu* (*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 ab 1940 *Chung Teh Hsüeh Chih*, 1939-1944 Mitherausgeber.
(主编) 《研究与进步》(1940年起改为《中德学志》)

1940

14. A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German Sinologists“, *MS V* (1940), S. 437-446.
Chines. Übers. in: *Chung Teh Hsüeh Chih* III/1 (1941), S. 78-91.
(论文) 德国青年汉学家

1942

15. A „Patents for Hereditary Ranks and Honorary Titles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MS VII* (1942), S. 38-67.
(论文) 清代世袭制度中的告封
16. B Otto Jörgens, *Chinesisch-Deutsches Taschenwörterbuch*, *Chung Teh Hsüeh Chih* IV (1942), S. 538-541 (in Chinesisch).
(书评) 袖珍华德辞典新编 (中文) (Otto Jörgens 编)
17. B Johannes Bühler, *Deutsche Geschichte I-III*, *Chung Teh Hsüeh Chih* IV (1942), S. 707-709 (in Chinesisch).
(书评) 德意志史 (第一至三卷) (中文) (Johannes Bühler 著)
18. M *Titelverzeichnis chinesischer Übersetzungen deutscher Werke*, Peiping: Deutschland - Institut 1942 (zusammen mit Dschang Schao-tien).
(专著) 德籍汉译存目 (同张绍典合编)

1943

19. A „Zur Kompilation und Überlieferung der Ming-Shih-lu“, *Sinologische Arbeiten* 1 (1943), S. 1-46. Chinesische Inhaltsangabe in : *Chung Teh Hsüeh Chih* V (1943), S. 373-380.
(论文) 明各朝实录的纂修及现存抄本考
20. B „Inhaltsangaben der chinesischen sinologischen Arbeiten in Chung Teh Hsüeh Chih“, *Sinologische Arbeiten* 1943, S. 163, 165-166, 167-169.

（书评）《中德学志》所载中文汉学论文提要

21. B „Chinese Documentary Publications concerning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 *The XXth Century*, Shanghai 1943, S. 311-313.

（书评）近百年来有关外交政策的中文文献

22. H *Sinologische Arbeiten*, 1943-1945.

（主编）汉学集刊（1943-1945）

23. V „Der chinesische Staat i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Collectanea Commissionis Synodalis in Sinis VI* (1943), S. 479-488 (Vortrag, gehalten in Peking am 26. April 1943).

（演讲稿）中国国家的过去及现在

24. V „Der chinesische Staatsgedanke“ (Vortrag, gehalten vor der [NOAG] Zweiggruppe, *NOAG 63* (1943), S. 42-50)

（演讲稿）中国的国家思想

1944

25. A „Juan Yüan (1764-1849)“, *MS IX* (1944), S. 53-80.

（论文）阮元（1764-1849）

26. A „Weitere Beiträge zur Kompilation und Überlieferung der *Ming Shih-lu*“, *Sinologische Arbeiten 2* (1944), S. 1-29.

（论文）再论明实录编纂及流传

27. B W. Fuchs,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Chung Teh Hsüeh Chih VI*, 1/2 (1944), S. 331-334 (in Chinesisch).

（书评）康熙皇與全览图研究（中文）（W. Fuchs 著）

28. B „Inhaltsangaben der chinesischen sinologischen Arbeiten in *Chung Te Hsüeh Chi*“, *Sinologische Arbeiten 2* (1944), S. 200-201.

（书评）《中德学志》所载中文汉学论文提要

29. B Gideon Ch'en, *Tso Tsung T'ang. Pioneer Promoter of the Modern Dockyard and Woollen Mill in China*, *MS IX* (1944), S. 250-251.

（书评）左宗堂（陈其田著）

1945

30. A „Yunglo's Mongoleifeldzüge“, *Sinologische Arbeiten 3* (1945), S. 1-54.

（论文）永乐北征蒙古

31. A „Nachtrag zur Kompilation und Überlieferung der *Ming Shih-lu*“, *Sinologische*

Arbeiten 3 (1945), S. 165-168.

(论文) 明实录编纂及流传补遗

32. B „Inhaltsangaben der chinesischen sinologischen Arbeiten in Chung Te Hsüeh Chih“, *Sinologische Arbeiten* 3 (1945), S. 184-186.

(书评) 《中德学志》所载中文汉学论文提要

33. H *Kleines Deutsch-Chinesisches Wörterbuch für den Anfang*, 1. Aufl. zus. Mit Sun Yun-chen, 1939; 2. vermehrte Aufl. unter Mitwirkung von Ku Hua und Ilse Martin, Peiping: Deutschland-Institut, 1945.

(主编) 德华常用小字汇 (与孙用震合编)

1946

34. A „Sinological Research Work in Free China during the War Period 1937-1945“, *Chung-guo wen-hua hui-k'an,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Chengtu-Nanking), 6 (1946/47), S. 137-171.

(论文) 抗战期间 (1937-45) 中国后方的汉学研究

35. A „Yü Ch'ein, Staatsmann und Kriegsmeister“, *MS XI* (1946), S. 87-122.

(论文) 于谦——政治家及兵部尚书

1947

36. A „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Important Literary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Chung-guo wen-hua hui-k'an,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VII*, (Chengtu-Nanking), 7 (1947/48), S. 107-224; *Studia Serica*, Monogr. Ser. A, No. 2, Chengtu 1948, 118 S.

(论文) 明史要目解题初稿

37. A „Frescos of the Ming Period in a Temple near Chengtu“, *SS VI* (1947), S. 192.

(论文) 成都附近一座寺院中的明代壁画

38. A „Ein Dokument zum Prozeß gegen Yü Ch'ien i. J. 1457“, *SS VI* (1947), S. 193-208.

(论文) 1457年审讯于谦的一个文件

39. H *Studia Serica*, associate editor, 1949-1950 editor zusammen mit Wen Yu.

(主编) 与闻宥共同出版西文汉学期刊 *Studia Serica*

1948

40. A „O. Franke und sein sinologisches Werk“, *Sinologica* 1/4 (1948), S. 352-354.

（论文）福兰阁及其汉学著作

41. A „Die Han-Zeitlichen Felsengräber bei Chia-ting (West-Ssuehuan)“, SS VII (1948), S. 19-39.

（论文）嘉定（川西）之汉代崖墓

42. B Robert des Rotours, *Traité des Fonctionnaires et Traité de l'Armé traduits de la Nouvelle Histoire des T'ang* (chap. XLVI-L), MS 13 (1948), S. 416-417.

（书评）有关官员和军队的法令：译自《新唐书》（Robert des Rotours 著）

43. B „Chinesische Quellen zur auswärtigen Politik des 19. und frühen 20. Jahrhunderts“, *Sinologica* 1/3 (1948), S. 210-230.

（书评）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对外政策的中文文献

1949

44. A „Introductory Note on the New Chinese Latinized Script Sin Wenz (Hsin wen-tzu), SS VIII (1949), S. 120-125.“

（论文）有关中文新的拉丁文字——“新文字”的说明

45. M *Addenda and Corrigenda to Pokotilov's „History of the Eastern Mongol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from 1368 to 1634“*, *Studia Serica*, Monogr. Ser. A, No. 3, Chengtu-Peiping 1949, 95 S.

（专著）Pokotilov 著《明代（1368-1634）东蒙古史》引得与更正

1950

46. A „Gräber aus dem 2. Jahrhundert n. Chr. in Ssu-ch'uan“, *Sinologica* 2/4 (1950), S. 294-298.

（论文）四川公元二世纪时的墓葬

47. A „Addenda and Corrigenda to 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Important Chinese Literary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SS IX (1950), S. 33-41.

（论文）“明史要目解题初稿补遗”引得与更正

附录二：中德学会出版的丛书和单行本一览表⁸⁴⁾

一、丛书系列：中德文化丛书

84) 本表主要依据“中德学会出版的丛书和单行本一览表”补充修订而成，原表见马汉茂等主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90-193页。

- 第1卷 贺麟等：《魏兰之介绍》，上海商务出版社，1934年。
- 第2卷 张富岁（译）：《阴谋与爱情》，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 第3卷 刘均（译）：《工作学校要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 第4卷 魏以新（译）：《德国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 第5卷 刘均（译）：《女青年心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 第6卷 冯至（译）：《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1938年。
- 第7卷 冯至（译）：《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北平：中德学会。
- 第8卷 杨丙辰（译）：《论德国民族性》，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
- 第9卷 魏以新（译）：《斯托姆小说集》，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
- 第10卷 魏以新（译）：《德国史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
- 第11卷 徐梵澄（译）：《快乐的知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
- 第12卷 杨丙辰（译）：《汤若望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42年。
- 第13卷 徐梵澄（译）：《哥德论自著之浮士德》，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
- 第14卷 关琪桐（译）：《优美感觉与崇高感觉》，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
- 第15卷 杨丙辰（译）：《赫贝尔短篇小说集》，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
- 第16卷 杨丙辰（译）：《亲和力》，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
- 第17卷 张星琅（译）：《历史之地理基础》，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
- 第18卷 关琪桐（译），《哲学论丛》，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
- 第19卷 杨丙辰（译）：《歌德短篇小说集》，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年代不详。
- 第20卷 常逊波（译）：《拉奥空论》，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年代不详。
- 第21卷 王静如（译）：《中国宇宙观念史》，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年代不详。

二、特刊系列：中德学会特刊

- 第1卷 张天麟主编/译：《德国留学指导书》，北平中德学会，1937年。
- 第2卷 王锦第（译），杨丙辰（校）：《今日德国教育》，北平：中德学会，1938年。
- 第3卷 弗立克：《统一国家之德国》，北平：中德学会，1939年（原文系英文，译者不详）。
- 第4卷 关琪桐（译）：《德国现代思想问题》，上海，1938年（原文系英文）。
- 第5卷 杨丙辰（译）：《1933年至1939年间德国之外交政策》，上海：商务印书馆。
- 第6卷 关琪桐（译）：《德国的精神》，原作者、书名以及出版地、年月均不详。
- 第7卷 项子酥（译）：《模范军人毛奇》，据胡隽吟：《德国学术》，版次见上，第167页，1945年此译本在准备之中，译本出版年代和地点均不详。
- 第8卷 曹京实（译）：《俾斯麦》，北平，1943年。

三、在北平出版的德语辅助教材：“辅助德语教材刊本”和双语读物“中德对照丛刊”

- 孙用震：《德华常用小字汇》，北平：中德学会，1939年。
- 杨丙辰（译）：《诗人伦慈》，北平：中德学会，1943年（中德对照丛刊，卷一）。
- 崔亮（译）：《海上魔旗》，北平：中德学会，约1943年（中德对照丛刊，卷二）。
- 吴兴华（译）：《黎而克诗选》，北平：中德学会，1944年（中德对照丛刊，卷三）。

四、在北平重印和编辑的德语汉学丛书

- Heinrich Hildebrand, *Der Tempel Ta-chüeh-sy bei Peking*, Berlin 1897（锡乐巴：《北京附近之大觉寺》）。
-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Leipzig 1881（贾柏莲：《汉文经纬》）。
- Otto Franke, *Aus Kultur und Geschichte Chinas. Vorträge und Abhandlungen aus den Jahren 1902-1942*（福兰阁：《中国文化与历史选刊》）。

五、杂志

- 《研究与进步》，第1卷（1939/40），第1-4号，北平：中德学会，1939年。
- 《中德学志》，第2卷（1940），第6卷（1944），北平：中德学会，1940至1944年。
- 《汉学集刊》，第1卷（1943），第3卷（1945），北平：中德学会。

六、书目

- 《德籍汉译书目》，编者傅吾康、张绍典，北平：中德学会，1942年。
- 《中德学会图书馆德文图书目录》，北平：中德学会，1940年。

七、年鉴

- 1933年至1934年年鉴，北京，1934年。
- 北平中德学会会务概况，北平，中德学会，1935年。
- 1935年至36年报告，北平，1935年。
- 1936至1937年年鉴，北平，1937年。
- 1937至1938年年鉴，北平，1938年。
- 1938至1939年年鉴，北平，1939年。
- 1939至1940年年鉴，北平，1940年。
- 1940至1941年年鉴，北平，1941年。

八、展会目录

- 《纪念诗人席勒展》，天津/北平，北洋出版社，1934年。

- 《德国当代印刷技术》，展览由北平国立图书馆和中德学会合办，参展名录，书籍和印刷品由中德学会制作，1933年。
- 《德国木刻艺术的过去与现在》，展览由中德学会主办，时间为1938年10月。北平：中德学会，1938年。

九、单行本

- 厉零士（译）：《一个军人之思想》，南京：正中书局，1936年（中德文化协会丛书）。
- 商承祖（译）：《双影人》，南京：正中书局，1936年（中德文化协会丛书）。
- 滕固（译）：《德国过去对于科学事业的维护》，南京：中德文化协会，1936年。
- 魏以新（译）：《世界大战的酿成》南京：钟山书店，约1936年。
- 张富岁（译）：《费斯克的判谋》，北平：中德文化协会。

附录三、西方人名中西文对照一览：（以汉译名首字汉语拼音为序）

A

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 1909-1989）

艾锿风（Gustav Ecke, 1896-1971）

B

白迟客（Petschke）

彼德尔（Hans Bidder）

毕汉斯（Hans Bielenstein）

宾格尔（Karl Büniger, 1902-1997）

卜德（Derk Bodde, 1909-2003）

卜恩礼（Heinrich Busch, 1912-2002）

C

查赫特（Herbert Zachert）

柴赫（Erwin von Zach, 1872-1942）

D

戴闻达（J. J. L. Duyvendak, 1889-1954）

杜鲁门（Harry S. Truman, 1884-1972）

F

- 费子智（Charles Patrick Fitzgerald, 1902-）
丰浮露（Eugen Feifel, 1902-1999）
佛尔克（Alfred Forke, 1867-1944）
福克司（Walter Fuchs, 1902-1979）
福兰阁（Otto Franke, 1862-1946）
傅汉思（Hans Hermann Fraenkel, 1916-2003）
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1912-2007）

G

- 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 1876-1937）
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1889-1978）
高罗佩（R. H. van Gulik, 1910-1967）

H

- 哈斯（Wilhelm Haas）
海尼士（Erich Haenisch, 1880-1966）
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
海西希（Walter Heissig, 1913-2005）
韩百诗（Louis Hambis, 1906-1978）
霍福民（Alfred Hoffmann, 1911-1997）

J

- 贾柏莲（Hans Conon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
贾德纳（Charles S. Gardner, 1900-1966）
金守拙（George Kennedy）

K

- 卡扎克维奇（Kasakevich / Казакевич А. В.）
康德谟（Max Kaltenmak, 1910-）
考德（Erich Kordt）
克和夫（Karl Kerkhof）
玛丽·考赫（Marie Koch）

L

- 劳琛 (Hans-Jürgen von Lochow, 1902-1989)
雷马克 (Erich Maria Remarque, 1898-1970)
雷兴 (Ferdinand Diederich Lessing, 1882-1961)
李华德 (Walter Liebenthal, 1886-1982)
李嘉乐 (Alexis Rygaloff, 1922-)
鲁道夫 (Richard Rudolph)
鲁雅文 (Erwin Rousselle, 1890-1949)
罗文达 (Rudolf Löwenthal, 1904-1996)
罗越 (Max Loehr, 1903-1988)

M

- 马汉茂 (Helmut Martin, 1940-1999)
马丁 (Ilse Martin)
马歇尔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1880-1959)
满恩礼神父 (Pater Heinrich Maas, 1890-1968)
赫达·莫里逊 (Hedda Morrisson, 娘家姓Hammer)
穆天民 (Joseph Baumgartner, SVD, 1913-)

N

- 诺尔特 (Heinrich Northe)

P

- 帕森斯 (James Bunyan Parsons, 1921-)
潘克甫 (Boris Ivanovič Pankratoff / Панкратов Б. И., 1892-1979)
璞科第 (Pokotilov / Покотиллов Д. Д., 1865-1908)

Q

- 齐赫文斯基 (Tichvinskij / 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1918-)

R

- 芮玛丽 (Mary Wright)
芮沃寿 (Arthur Wright)

S

- 司徒资（Joseph Stulz, 1877-1940）
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 1865-1952）
山尚德（Dominicus Schröder, SVD, 1910-1974）
石（时）眉鸣（Gerhard Schreiber, SVD, 1911-1972）
索尔茨（Adam von Trott zu Solz）

W

- 瓦德施米特（Ernst Waldschmidt, 1897-1985）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卫德明（Hellmut Wilhelm, 1905-1990）
吴德明（Yves Hervouet, 1921-）

X

- 西门华德（Ernst Julius Walter Simon, 1893-1981）
锡乐巴（Heinrich Hildebrand, 1854-1925）
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
谢理（礼）士（Ernst Schierlitz, 1902-1940）
许勒（Wilhelm Schüler）

Y

- 颜复礼（Fritz Jäger, 1886-1957）
叶德礼（Matthias Eder, SVD, 1902-1980）
于儒伯（Robert Ruhlmann, 1921-1984）